



THE WORLD THROUGH
MODERN CHINESE EYES

胡愈之

莫斯科印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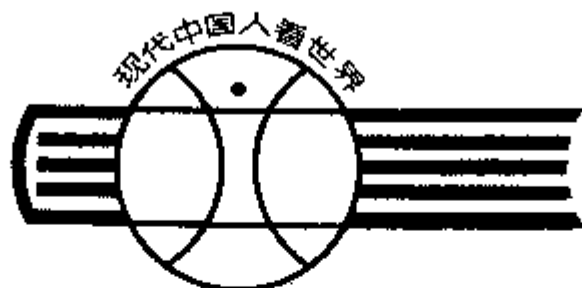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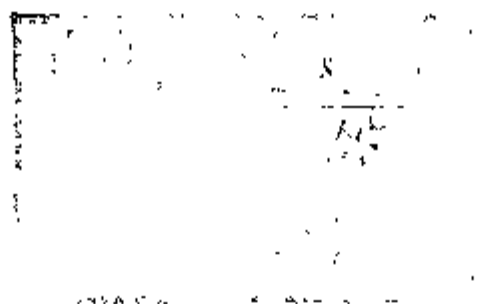
3-66

胡愈之

莫斯科印象记



200303279



THE WORLD THROUGH
MODERN CHINESE EYES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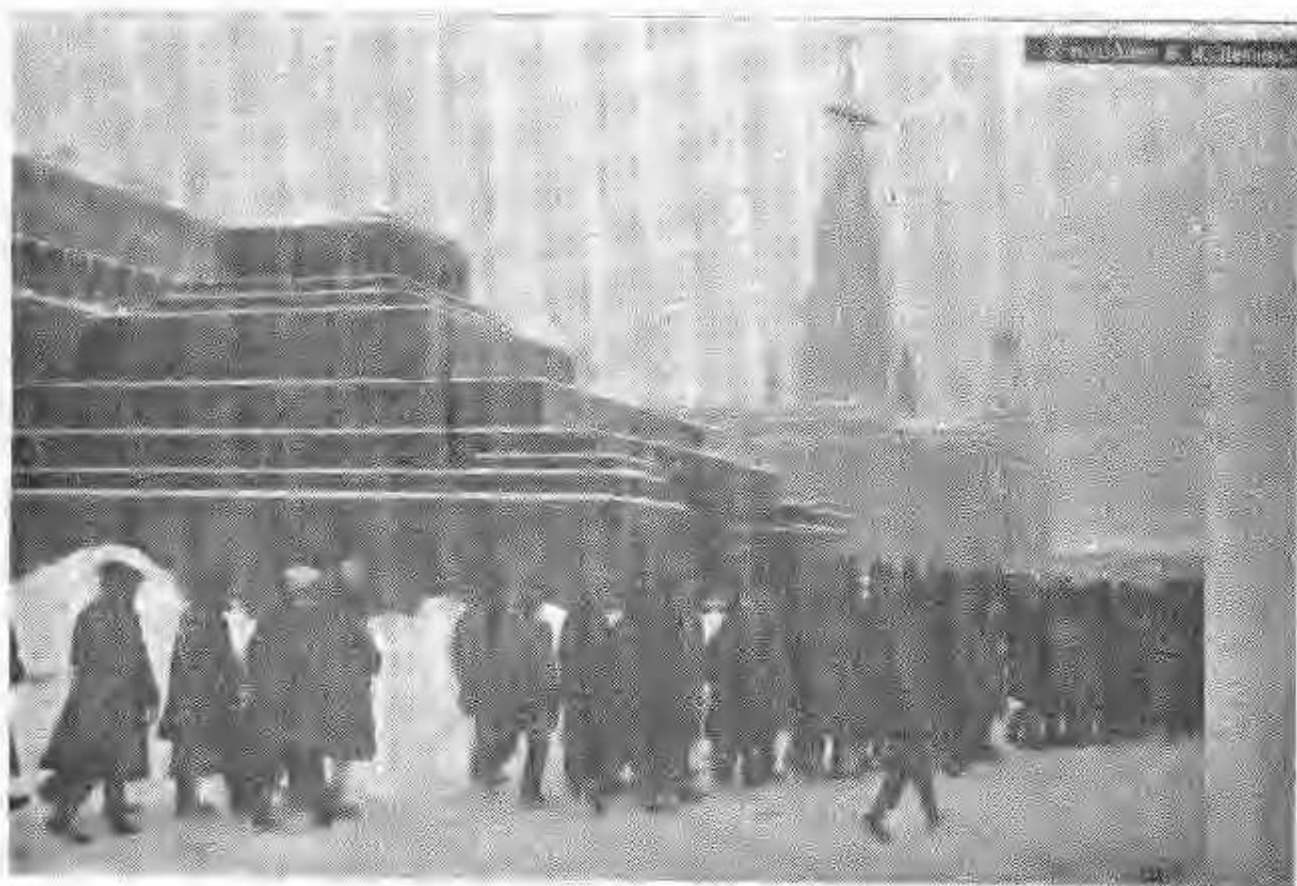


作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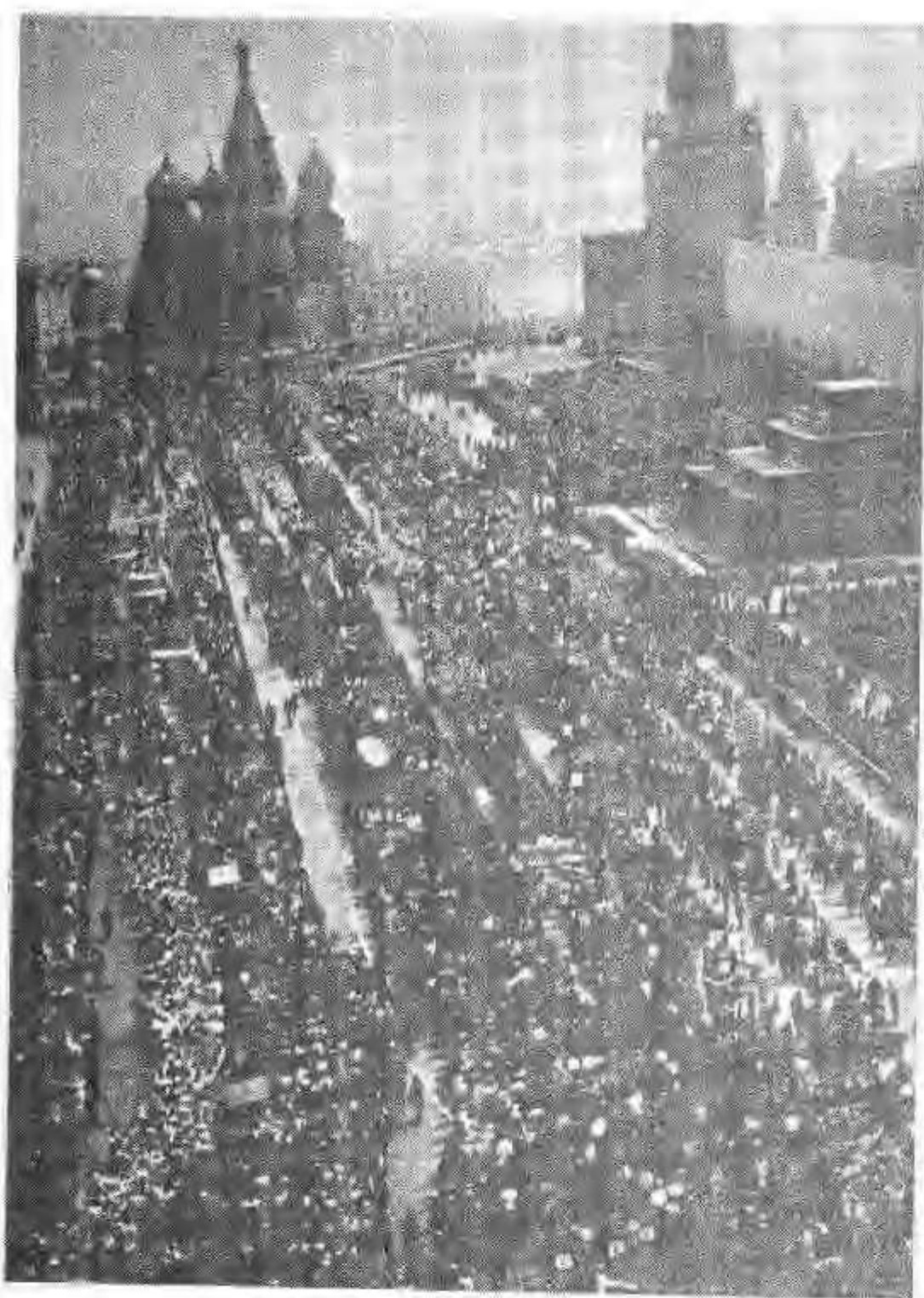


1931年於東京在德用字報《同音文藝》世（世界語）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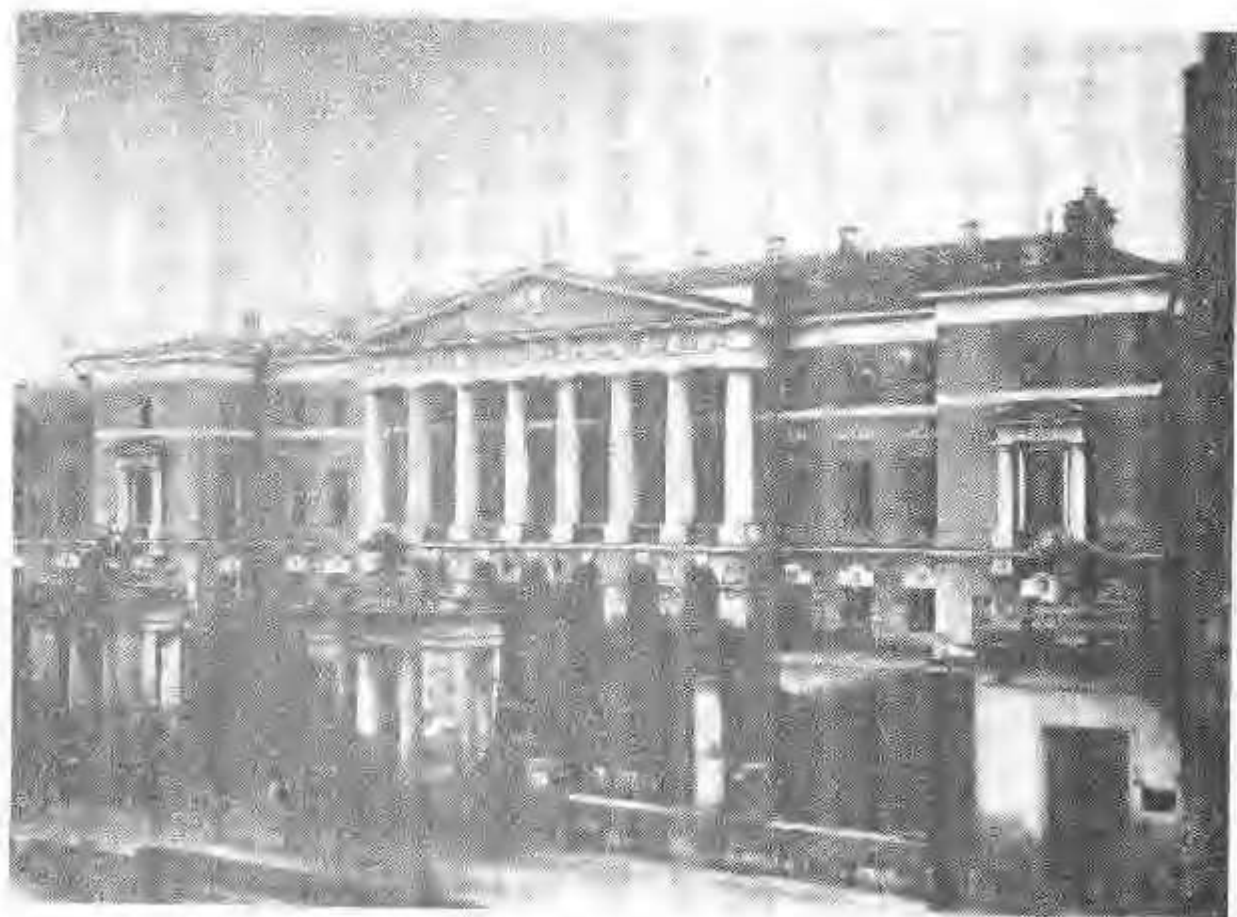
克里米亞女學生與作詩者合影。



蘇聯人民在寒冬中冒雪瞻仰列寧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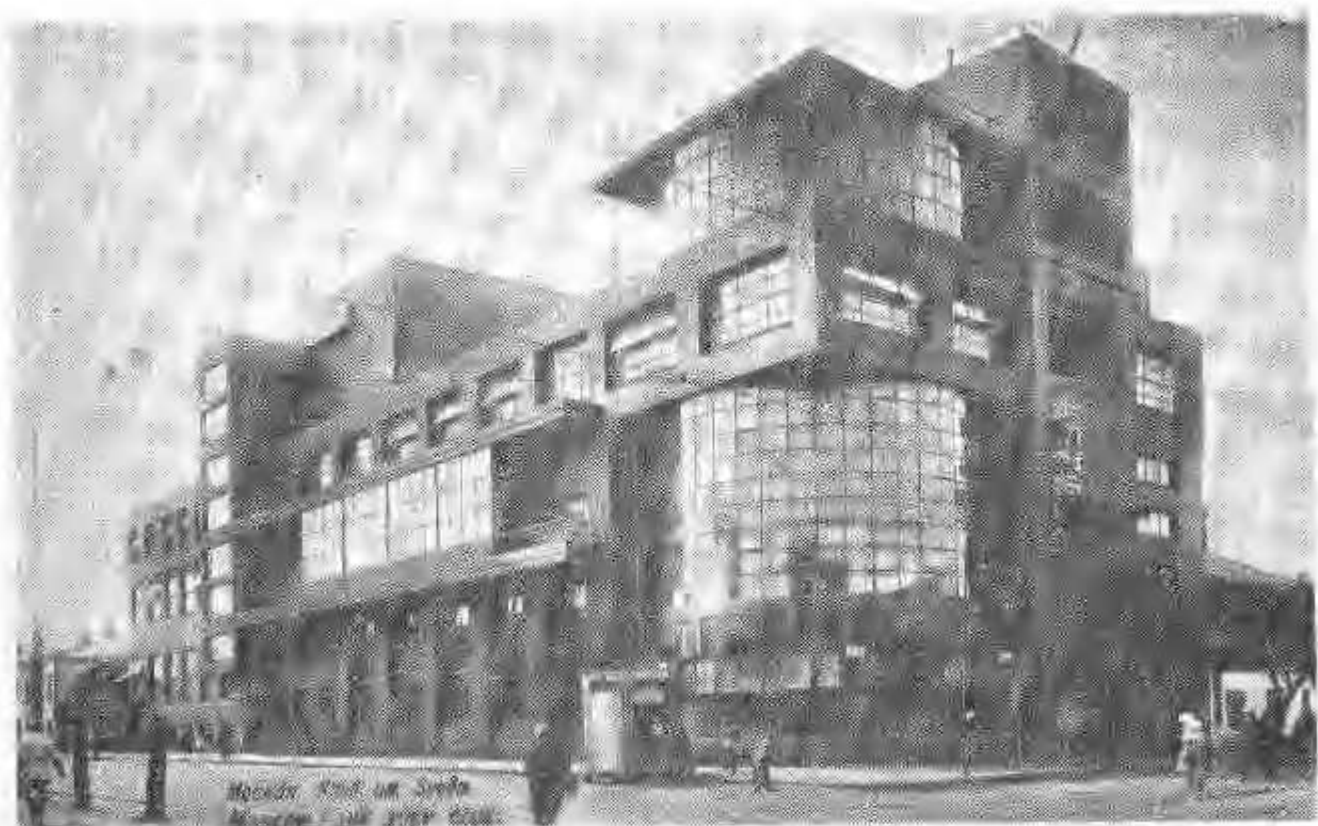
红卫兵一百万人大游行。



莫斯科革命博物馆。



莫斯科中央百货商店。



莫斯科的一新工人俱乐部。



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电影微市场。



莫斯科的住宅建筑



幸福的苏联儿童生活。

《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凡例

一、《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选刊1911年——1949年期间各界人士对外国直接观察的记述。丛书冠以“现代”一词，并不是以1911年作为划分近代和现代、以1949年作为划分现代和当代的时间界限，只是因为已经有了一部专收1840年——1911年期间出国载记的《走向世界丛书》，而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思想已经渐渐为许多中国人（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有条件对外国进行直接观察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了。

二、如果说，《走向世界丛书》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时的认识变化过程，那末，这部《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所反映的，便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带着中国的问题去观察世界形势，又从世界的全局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结果。世界在不断地变化，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这个过程到现在并没有完结，当然也不会完结。本丛书所能做的，是揭示若干个侧面和断面（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侧面或一个断面），使今天的人们能够对于这个过程做一点微观的研究，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具体的了解。

2042. 1-5 4

三、基于这个目的，本丛书采辑将不限范围，无论是社会政治之考察，文化学术之交流，实业技术之研究，风土人情之采访；亦不拘体裁，无论是旧版图书、报章杂志，以及书简日记、手稿遗文，只要有助于人们认识外国和中国，有益于历史文化的积累，皆可入选。

四、辑印旧作，凡作者健在者，均请作者加以校订，新写序言。凡作者已逝世或不在国内者，即按原文排印，只校正原来由于技术原因所造成的差错，文章和内容一般不加改削。有必要时，当然也可以附加一点评介文章，指出今天读者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尊重作者，更重要的是为了尊重历史。有的书和作者如有违碍，宁可暂时割舍，也不妄作改动，俾免有损原貌，贻误后人。因为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文字，有些事过境迁，当然与当今之报道不会完全一致，但其历史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此，谅亦为广大读者所能理解者也。

Al moskvaj gekamaradoj, kiuj volonre gastigis,
helpadis, gvidadis min dum mia vizito de la ĉefur-
bo de tutmonda proletaro, mi dediĉas tiun ĉi libre-
ton.

Hujucz

我谨将这本小书，献给莫斯科的男女同志们，当我访问全世界无产者的首都时，他们自愿地给予我以接待、帮助和指导。

胡愈之

（戈宝权译）

目 次

重读胡愈之著的《莫斯科印象记》	戈宝权 (1)
--------------------------	---------

莫斯科印象记

序.....	(16)
跨进普罗之国.....	(19)
两个“老乡”.....	(20)
莫斯科车站.....	(23)
奇景.....	(26)
电车上的斗争.....	(27)
莫斯科苏维埃.....	(28)
D同志的家庭.....	(29)
住宅荒.....	(31)
新闻记者的食堂.....	(33)
艰难的过渡期.....	(34)
寝室内的欢迎会.....	(37)

无产者旅行社·····	(39)
几个同居者·····	(41)
五日休息制·····	(43)
盲诗人的消息·····	(44)
煤油、盐、面粉和傻子的故事·····	(46)
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	(49)
政治·劳动·行乐·····	(53)
标准工人住宅·····	(57)
无产文艺者的“家”·····	(60)
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	(63)
乡苏维埃和国立医院·····	(66)
中央电局·····	(67)
少年先驱大会·····	(68)
两教授的会见·····	(71)
巴尔干小朋友·····	(72)
R女同志的历史·····	(76)
纺织工厂·····	(78)
谷麦托辣斯·····	(82)
克列姆林·····	(87)
列宁墓·····	(89)
苏维埃选举会·····	(91)
世界语者的招待会·····	(93)
阿摩汽车工厂·····	(94)
工厂生活·····	(96)

托儿所.....	(99)
大戏院的跳舞剧.....	(101)
生活教育·劳动教育.....	(107)
一个小学校.....	(110)
国家银行.....	(115)
两世界.....	(117)
后记.....胡愈之	(121)

重读胡愈之著的《莫斯科印象记》

重读《莫斯科印象记》

回想起来，那还是三十年代初的事。我当时在上海望平街（现山东路）的《时事新报》馆工作。有一天，我从报馆斜对门的新生命书店门市部，买到了一本胡愈之著的《莫斯科印象记》。无论是这本书的封面和里封面的设计，还是书里附的多幅美丽的插图，更不用说正文的生动而有趣的叙述，都非常吸引人，我差不多是一口气就把它读完。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个禁止使用的名词，因此著者不得不用音译的“普罗”来代替。于是我就跟着著者“跨进普罗之国”，在一个寒冬，作了七天难忘的旅行。

一九三五年初，就在胡愈之访问莫斯科之后的第四年，也同样是一个寒冬，我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和《新生周刊》与《世界知识》的特约通信员前往莫斯科，在我的书包里就带着这本《莫斯科印象记》。恰好我住在Grand Hotel（大饭

店)，克里姆林宫、红场、莫斯科苏维埃、大剧院、中央电报局，都就在近旁；稍远的通西欧的白俄罗斯火车站和去远东的雅罗斯拉夫火车站（通称北火车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就按《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一一寻访旧迹，因为当时莫斯科的面貌变化还不大；而且多少年来我始终珍藏着这本书，因为它是最初使我认识了苏联这个“普罗之国”的。

去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准备编印一套《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他们已把我叔父戈公振写的《从东北到苏联》收进去。编者征询我的意见，还应收一些什么书，我当即推荐了胡愈之著的这本《莫斯科印象记》，而且写信去征求著者的同意。去年八月四日胡愈老复了我一封信，其中说：

关于《莫斯科印象记》重印事，……这本书是五十二年前写的，现在没有什么用处。湖南人民出版社如要重印，我亦不反对，由你写序言亦可。

著者说这本书“现在没有什么用处”，事实上它帮助我们了解五十多年前苏联从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形，还是很有参考价值。正因为这样，我重读了这本书，并怀着激动的心情来为它写这篇重印前言。

我所认识的著者胡愈老

胡愈之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新闻、编辑、出版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我国老一辈的世界语者和世界语运动的活动家。他今年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我们一向都尊敬地称他为胡愈老。

他于一八九六年九月九日诞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因此他现在讲话时仍然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他少年时，曾在绍兴读过中学，是鲁迅（即周树人）的学生。一九一三年他通过函授，开始学习世界语。一九一四年十八岁时，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来被分配到《东方杂志》担任编辑工作，成为他从事编辑和新闻工作的开始。这就使我回想起，在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刊物中，《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和《学生杂志》，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特别是沈雁冰（即茅盾）在一九一六年也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他在一九二一年革新了《小说月报》，一九二二年即由郑振铎担任主编，在当年同《东方杂志》都成为最重要的刊物。我年青时就从它们得到了不少营养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开始在《东方杂志》上经常看到胡愈之写的文章和翻译的外国小说。一九二一年底，俄国用世界语写作的盲作家爱罗先珂到了上海，胡愈之最初同他相识，翻译了他有名的献给中国人民的小说作品《枯叶杂记》，发表在《东方

杂志》上，而且通过他的关系，介绍爱罗先珂到北京去同鲁迅相见。这时期胡愈之在《东方杂志》编辑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如为了纪念《东方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编辑了一套包括八十二种书的《东方文库》丛书，其中即收有他翻译的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

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五卅运动纪实》一文，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他当时不过才二十九岁。接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当晚胡愈之就和李石岑、郑振铎等人联名写信给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对蒋介石的反动暴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一九二八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胡愈之和郑振铎都不得不流亡国外。郑振铎去到英国，胡愈之去到法国，在法国共住了三年。这时法国货币贬值，生活费用并不贵，他就经常为《东方杂志》写稿，靠了稿费自筹学费和生活费用。后来由于法国货币涨价，难于生活，他就在一九三〇年年底离开法国，经德国、波兰和苏联回国，在路经莫斯科时，得到苏联世界语者的协助，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进行参观访问，回国后他就着手写《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版，到了一九三二年十月已印到第五版，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本书能在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各种进步书刊的条件下得以出版，确是件

侥幸的事。

他返国后仍然回到商务印书馆，负责主编《东方杂志》，直到一九三三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参加了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编辑工作。三十年代初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和《生活》周刊的工作，“一二八”战争期间，曾同邹韬奋，还有我的叔父戈公振等人，筹备创办代表民众喉舌的《生活日报》。一九三三年又和邹韬奋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保卫人民权利而斗争。

由于胡愈之和我的叔父戈公振是老朋友，他们在法国时也曾多次见面。记得我的叔父在一九三三年访问苏联时，胡愈之曾在四月二十一日写信给他，其中说：“兄得一机会，畅游新俄，审察社会主义建设情形，不胜羡慕。弟意苏联领土广大，兄最好能作长时期之考察，尤当赴乌克兰、南俄、高加索及西伯利亚，对于合作及国营农场亦加视察。对于人民生活状况及文化教育尤不宜忽略。如是归国后，其所得较诸弟一星期间走马看花，必胜万倍。返国前能将观感所得随时写寄，投登国内报刊，尤为读者之幸。”这时生活书店正计划出版一套《时事问题丛刊》，胡愈之和邹韬奋又曾联名写信给我的叔父约稿，请他“于游踪所及”，写一本一两万字的小册子，列入丛刊发表，而且在报纸上发表的预告中，已列有戈公振著《苏联观感录》一书的书名。

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在莫斯科时，胡愈之在巴黎曾从法文翻译了一本苏联儿童读物作家伊林写的《书的故事》。他请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艾寒松协助弄清几处疑问，这件

事就是由我写信向伊林询问的。我直到一九三八年初从国外回到武汉，在敬爱的周总理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时，才在汉口初次见到胡愈之，这时他正在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工作。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去到香港工作，这时胡愈之正在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避居印尼，我们对他是非常挂念的，这样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才又再见面。

胡愈老多年来从事新闻、出版事业和世界语运动，同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现在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长。

令人难忘的七天

现在让我们打开《莫斯科印象记》来看看吧。

胡愈之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到达莫斯科的。他当时只有过境签证，照例仅能在莫斯科停留七、八个小时，当晚就得乘开往远东的火车回国；但他靠了苏联世界语者R女同志（她原是匈牙利的世界语运动者）向莫斯科苏维埃办交涉，提出申请说莫斯科世界语会要请他演讲，非停留不可。这样他就获得了在莫斯科停留七天的准许。为什么说这七天是“令人难忘的”呢？因为这七天从早到晚几乎全布满了各种活动日程，使他有可能接触到苏联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通过参观访问对苏联

这个“普罗之国”有了一个概括的、但印象却是颇为深刻的认识。

他的活动日程是：

一月二十七日，在零下二十到三十摄氏度的寒冬到达莫斯科。在中央邮局工作的世界语者R女同志及一位同事，还另有两位世界语同志去到车站迎接。他们从白俄罗斯火车站乘电车前往莫斯科苏维埃，经过交涉，得到停留七天的许可。访问苏联世界语同盟总书记D同志，与D同志夫妇在记者食堂共进午餐。奔走解决住宿问题，直到当晚方在福金街二号无产者旅行社的公共宿舍里找到一个床位，受到同宿舍的旅客们的热烈欢迎。

一月二十八日晚起，下午由R女同志陪同去火车站取行李，再回到苏联世界语会总事务所，请求介绍去访问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俄文为B.O.K.S.，英文为V.O.K.S.）。在世界语会打听到爱罗先珂的消息。然后在街上购买零物。当晚在住宿处参加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两城的旅馆业劳动者生产竞赛大会，在主席团就座，并致了贺词。会后参加宴会和舞会。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访问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总部，偶识退伍军人、世界语者U同志，约到他家吃中饭，饭后参观莫斯科南郊新工人住宅区，还参观了乡苏维埃和两处医院。晚参观中央电报局，并到附近的一所大戏院参加少年先驱（少先队）大会。

一月三十日，午前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和R女同

志陪同参观共产党大学(即共产主义学院)，拜会著名的经济学家瓦尔加教授和中国问题专家沃伊丁斯基教授，并顺道参观中央图书馆。午后，R女同志陪同访问《文艺新闻》主笔I同志的家，I同志不在，得识I夫人和讽刺画家K女同志。

一月三十一日晨，U同志及R女同志陪同参观“三山”纺织工厂，午后参观谷麦托辣斯。

二月一日，参观克里姆林宫，并拜谒列宁墓。晚六时至福金街联络工人俱乐部先参加家庭妇女举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会，后参加莫斯科世界语者为他举行的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言。

二月二日，上午到职业工会总部访问J同志，同进午餐后，由J同志和U同志陪同参观阿摩汽车工厂，了解工厂的设施，参观了工人食堂、工人补习学校、工厂日报编辑部和托儿所等地。晚至莫斯科大戏院观看关于中国题材的舞剧《红花》。

二月三日，参观莫斯科模范小学，至国家银行兑换外币。当天薄暮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经过八天的行程到达满洲里。

这短短的七天的日程是多么丰富！尽管作者在序文中说：“我劝告诸君，对于本书最好不要有什么大奢望。诚然，现在有许多人，颇想明了苏联的内情。但我这一本小书却不能给他们一个满足。我只是偶然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除了首都以外，占全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苏维埃联邦，

我都没有到过。靠了这一点浅薄的经验，想明了苏联及其空前革命的实迹，那简直是梦想了。……要是有人想从我这书中，找出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的失望一定是更大了。”但凡是在三十年代初读过《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的人，都从它得到了深刻的印象，在思想上受到了不少启示。

胡愈之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第十三年，也就是在苏联人民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2)的第三年初访问莫斯科的。这时莫斯科的人民刚刚庆祝了莫斯科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装起义的二十五周年，同时又正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从一月十六日到二十六日)，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人，因此他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竟一时找不到一个住处。实际上，这时苏联人民正在从事艰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生活供应和住房各方面还都存在着不少困难，这也就是书中所说的“艰难的过渡期”吧！难怪迎接他的R女同志对他说：“到了这里，一时会感到不舒服吧。其实现在的莫斯科，物质的困难，可以说大半解决了，只有住宅恐慌，使你受了些苦。要是你在十年前，内战饥寒的时期，来到莫斯科，那时你才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苦呢。社会主义现在是正在诞育中。一个小孩产生，都要经过分娩的痛苦，产生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新社会、新秩序，怎么能不感到困难呢？但是我们苏联的人民却甘心忍受着这些困难。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精神的快乐，足以抵偿物质的困难而有余。”苏联讽刺画家K女同志也对他讲过：“现在时光容易过了。革命的最

艰困的时期已成过去的恶梦了。现在我们是过着生平最美满的日子。而且是过最合理的、公平的生活。……现在我们已没有忧虑。”这些话讲得是多么正确！

胡愈之在莫斯科的七天当中，靠了苏联世界语同志们的帮助，他先拜访了苏联世界语会总事务所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得到他们的协助和安排，参观了许多地方，并搜集到了一些有关苏联五年计划及介绍苏联文化事业的书籍和资料。他访问了苏联党和政府所在地的克里姆林宫，他到红场的列宁墓瞻仰了伟大革命导师的遗容。在工业建设方面，他参观了重工业的阿摩汽车工厂，轻工业的三山纺织工厂，了解了工厂的建设和与工人福利有关的各种设施。认识到“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还未免过早，但却是向着这方向走去，其最显著的事实，即……从前工厂只是劳动的场所，而现在逐渐成为饮食、休息、娱乐、教育、养育儿女乃至一切人类活动的场所”。他到达莫斯科时正是寒冬，到处的田野全被白雪掩盖着，但他访问苏联国营农场的总管理机关“谷麦托辣斯”，了解到苏联农业政策的梗概和苏联农业改造的计划。他在书中指出：“说到农业集团(体)化，国内似乎还少有人注意。依我个人看来，这是布尔希(什)维克革命的最大胆的工作，这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最猛烈的进攻。十月革命是震动全世界的一件大事，但在在我看来，一九二九——三〇年苏联的农业集团化运动，意义和十月革命一样重大。因为这是摧毁了苏联国内资本主义的最后壁垒。”

在科研和文教建设方面，他访问了苏联的最高学府共产主义大学(即共产主义学院)，拜会了著名的经济学家瓦尔加教授和中国问题专家沃伊京斯基教授，参观了中央图书馆，他参加了“少年先驱”(少先队)的大会，还访问了莫斯科的一所模范小学，了解到儿童们怎样整天在学校生活，“学校便是整个的儿童社会，社会便是儿童的学校！”他在同世界语者U的谈话中，了解到苏联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情形，这就是苏联所提倡的“以社会主义为内容，以民族为形式”的多民族的文化。

他有机会到过莫斯科市苏维埃和一个乡苏维埃，访问了莫斯科南郊的新工人住宅区和医院。他参加了旅馆业劳动者的生产竞赛大会，了解到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竞赛和“冲锋队”(突击队)的制度。他在莫斯科时受到了无产者旅行社旅客们的热烈欢迎，参加了家庭妇女苏维埃代表选举大会，以及莫斯科世界语者为他举行的招待会。总之一句话，在短短的七天当中，他接触到了各方面的人士，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我在这一星期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团体生活的乐趣。”

一次使用世界语的旅行

胡愈之精通英语、法语和世界语，但他不懂俄语，因此他在访问莫斯科时，作为一个世界语者，靠了苏联世界语者的帮助，作了一次使用世界语的旅行。

他在离开巴黎以前，曾从国际工人世界语团体的年鉴中，看到几个莫斯科世界语同志的地址，就写了信去，告诉他抵达莫斯科的日期。果然不出他的预料，当火车开进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两个世界语的女同志挥着小绿星旗在站台上迎接他，此外在车站里还有另两位世界语的同志N和L。正如他所说的：“异国的世界语同志，初次见面时，照例是和见了家里人一般的亲切。中国人讲着世界语来到苏联的更是不常有，所以他们见了我也就和我见了他们一样的欣喜。”

在莫斯科访问的期间，他得到帮助最多的是在中央邮局的R女同志。R女同志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匈牙利的世界语运动者。她在匈牙利的京城布达佩斯创办了当时著名的世界语刊物。“她对于世界语的精通，在当时匈牙利是数一数二的。”她参加了建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失败之后她不得不流亡到苏联；正因为这样，她同匈牙利的革命家库恩·贝拉、经济学家瓦尔加教授都很熟。R女同志为人热情，当胡愈之在莫斯科时，正碰上最冷的季节，R女同志怕他冻坏了，用自己的皮大衣裹着他；当他滑跌了一跤，她赶忙把他扶起来，用手挽着他走，在为他办理各种交涉和后来陪同参观访问的时候，不但毫无倦容，而且象母亲一样地抚慰着他。胡愈之在书中说：“如没有她（R女同志）陪伴着，我便成了聋哑盲人，不懂得一句话，不认识一条路，偌大的莫斯科，我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啊。”当然，到车站去迎接他的N和L两同

志，也给了他不少帮助。

胡愈之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由N同志陪同首先拜访了苏联世界语同盟的总书记D同志，当他知道他是从法国来的，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国际工人世界语组织的事。胡愈之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靠了D同志的努力，才终于在无产者旅行社找到了一个住宿的床位。当莫斯科的世界语者为胡愈之访问莫斯科举行招待会时，D同志代表苏联世界语同盟莫斯科分会致词表示欢迎，其中说道：“目前苏联和中国国交虽尚未恢复，但这两大民族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不久必能重新携手。这两大民族共有六万万的人口，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陆地，一旦联合起来，世界平和方有保障。而使这两个民族联合，国际公用语Esperanto实是唯一必需的桥梁。”据我所了解，这位D同志，就是苏联著名世界语者德列津(Ernest K. Dreren, 1892—1937)，他还著有《柴门霍夫传》(1929)、《世界语史》(1931)等书。

此外，胡愈之还得到不少莫斯科的世界语同志的帮助。如他在访问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时，还未走出大门，凭着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鞑靼共和国的无产作家U同志。U同志原是喀山地方的纺织工人，一九一七年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中他被任命为司令官，到内战停止后退伍，用鞑靼文从事写小说。他请胡愈之到他家去作客，同他的夫人歌剧演员见面。U同志还陪他参观了中央电报局、少年先驱大会，参观了“三山”纺织工厂，为他弄到了到大戏院观看舞剧《红花》的戏票。另一位J同志，据说曾经

教过爱罗先珂的世界语，他在苏联职业工会总部工作，曾陪同他参观阿摩汽车工厂。

总之，胡愈之在莫斯科访问的七天期间，置身在世界语同志们当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世界语者的那种真诚的国际主义“同志爱”。用他的话来说：“我在那里是一个生客，但是住了一二天，就觉得个个人是可亲的、坦白的、热情的。”正因为这样，“为了酬答莫斯科的朋友们的礼让与善意，我才写了这一本小书”，即《莫斯科印象记》。

在这里不妨提到的，就是自从波兰学者柴门霍夫以“希望者博士”的名字在一八八七年出版了《世界语第一书》以来，已快一百年了。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中，世界语在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世界语运动也在各国普遍开展。我国也是很早推行世界语的一个国家，鲁迅是最早赞成世界语的一个人，胡愈之早在一九一三年就开始学习和运用世界语，为宣传世界语做了很多的工作。他靠了世界语在路过莫斯科时进行访问，从此就不难看出，以绿星为象征的希望者的语言——世界语，是有着无限的生命力的！

随着世界语的流传，用世界语到苏联访问的，如日本的世界语者秋田雨雀就是一个例子。我还记得一九五六年胡愈之率领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我当时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和秘书长。我们在莫斯科时，同住在新建的“列宁格勒”大饭店。记得胡愈之当时曾告诉我，说他当时戴着世界语的绿星章，偶然在楼下的书报亭旁碰见了苏联的世界语学者博卡列夫教授，并谈了有关世界语的一

些问题。

日本世界语者秋田雨雀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访问莫斯科，他回国后曾写了一本《青年苏维埃俄罗斯》（这本书曾有过中译），其中说：“知道苏俄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记》的序文中说：“苏维埃联邦正在改造的途程中，它的将来，还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单就日前说，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他在参观阿摩汽车工厂的托儿所时，曾在来宾参观簿上写了这几句话：“我祝贺着这些在自由平和的空气中生长而不知人世忧患的苏联的劳动者的孩子们。会见了这些天真可爱的小朋友们，我对于人类后代的幸福，才有了确信了。”这些话写的是多么好！我在重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之后，这些话长久地回旋在我的耳边。尽管这本书所描写的是五十三年前他在莫斯科七天短暂的停留中所见到的情况，但它们让我们知道了当时的苏联人民怎样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为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斗争，在今天重读这本书，还是可以从它得到鼓舞和启示！

戈宝权一九八四年三月于北京

序

日本的世界语者秋田雨雀^①先生于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游俄归来后写了一本《青年苏维埃俄罗斯》。在那书里，他说：

“知道苏俄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

苏维埃联邦^②正在改造的途程中，它的将来，还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单就目前说，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而就我所见，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

在莫斯科使我最惊奇的，是我所遇见的许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爱、活泼、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义，以为苏维埃的生活是冷酷的、机械的、反人性的。我的所见，恰巧是相反。我在那里是一个生客，但是住了一二

① 秋田雨雀（1883—1962）日本戏剧家、儿童文学家和世界语者，曾于1927年访问苏联。

② 苏维埃联邦 现通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下同。

天，就觉得个个人是可亲的、坦白的、热情的。

但是想起来这也并不是以惊异。因为苏维埃革命，是以废除掠夺制度、奴隶制度为目的的。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间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了。

说布尔希维^①主义是“恨的宗教”的，分明是在说谎。试想国家、种族、阶级、身分的成见除去了以后，再有什么能阻碍人与人的相爱呢？自然，阶级斗争还在猛烈地继续着。但愈是在勇猛的火线里愈显出人类大众的同仇敌忾。Remarque^②的《西线无战事》，成为时下流行读物，不就是因为他所描写的战壕中的camaraderie^③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吗？

奴隶打破了锁链以后，奴隶便是大勇者。不然，对于苏联产业改造的超亚美利加^④的速率，便无法解释了。

要是我们的知觉还未完全麻痹了，当着这伟大的创造和这些诚实、勇敢、热烈的创造者的面前我们是不免要面红耳赤的。

为了表示我的惊奇与愧怍，并为了酬答莫斯科的朋友们的礼让与善意，我才写了这一本小书。

① 现通译布尔什维克。下同。

② Remarque 雷马克（1898—1970），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是他在1929年写的一部反战小说。

③ camaraderie 法语，意译为同志爱。

④ 指美国。

本书的目的，也就不过如此。除此外，我劝告读者，对于本书最好不要有什么大奢望。

诚然，现在有许多人，颇想明了苏联的内情。但我这一本小书却不能给他们一个满足。我只是偶然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除了首都以外，占全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苏维埃联邦，我都没有到过。靠了这一点浅薄的经验，想明了苏联及其空前的革命事业的实迹，那简直是梦想了。

（为了使这些关心苏联内情的读者，不至过分地失望，我愿意把本年天津《大公报》所载的“苏联特约通信”^①介绍给他们；虽然这位通信员的观点并不和我相同，但我敢相信在国内关于苏联的新出版物中，这是仅有而比较忠实的一种。）

要是有人想从我这书中，找出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的失望一定是更大了。因为观念和主义是为了别种目的用的。我并没有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写这本书，这是很明白的事。也许竟有人截取了我的文字的片段；去回护他自己的观念主义，或攻击别人的观念主义，那么，只好由他们去胡缠，我哪里理会得这许多。

著者

一九三一·七·二八于上海

① 指曹谷冰著的《苏俄视察记》，作为《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之一，即将由本社出版。

莫斯科印象记

跨进普罗^①之国

从巴黎开来的国际列车，通过波兰境内最末一个车站后，便鸣着悠长的汽笛，放低了速度开行。不上一回儿，已到了苏联边境。这样地旅客便从白色的法西斯国家，跨进了赤色的苏维埃国家，可是并不曾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从车窗向外探望，只见路轨的两旁，有两列的红军放着步哨。这些哨兵都披着黄色皮大氅，臂上和帽上缀着红星章，枪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个个全是雄纠纠，顶呱呱。他们，他们原来是世界第一个无产国家的前线的守卫卒，他们要防御全世界的布尔乔^②国家的袭击，自然格外要耀武扬威，才见得普罗国家是不可轻侮的。

进了俄国边境，车便在奈戈莱罗亚 (Negoreloe) 车站停下。旅客照例在这里检验护照行李，随后换车开往莫斯

① 普罗列塔里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下同。

② 布尔乔意为资产阶级。下同。

科。从西欧第一次到俄国的旅客，对于入境检查，都不免有戒心。但就我个人的经验，入俄境的检查并不比法、德、英、比等国的入境检查更麻烦。俄国的检查员，对旅客很和气，不象别国税关吏那样地板起面孔。下车的中国人，除我以外，有两个青田小商人。我们的行李只约略看了一眼，并不留难。只有我们旁边一个日本人，象大学教授的模样，带的箱笼很多，却一件件地细细检查过，连随带的德文画报和日记册都一页一页地翻阅过。税关内部的布置，和别国税关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不同的就是壁上满贴着赤色的标语，此外还有赤色救济会的招待所。在车站上最觉得可异的，是站上办事人员的从容不迫的态度。站内的搬运夫替客人提行李，老是慢吞吞地走着，客人催促着，他也不理会。检查员也是如此。绝不象在别国车站所见的那样匆忙紧张。有人说这是斯拉夫民族的习性，所以如果你只到了俄国的车站，你便不能相信，他们是在厉行五年的工业化计划，是在用着所谓“布尔希维的速度”，追赶美国的生产阶段呢。

两个“老乡”

午后七点半，旅客都上了车。这车是直达满洲里的。三等车的设备很不坏，四个人占一小间，每人各占一铺位，比头等车厢差，只是没有软椅垫。每一辆车内都有冷热自来水管。有一间是茶房住的。茶房的一小间内，便悬挂着

五年计划的图表，五年内全国造几条铁道，运货和乘客的数目逐年增加多少，全列在表上。据说车上的茶房都必须把这些图表数目字记熟。

车到了敏斯克（Minsk）^①上来了两个“老乡”（侨欧华工称同国人叫“老乡”）。闲着没有事，便找他们谈天。一个“老乡”是浙江青田人，在敏斯克工厂作工，一个是山东人，佩着一枚绚烂的红军勋章，他是在俄国内战时加入红军去上阵，而且立过军功的。我为好奇心所驱，便和这位红军的“老乡”交换了以下的谈话：

“你老在俄国住的很久了罢。”

“不久，也不过十多年。”

“初来俄国时干什么？”

“来做工的。后来就帮他们打仗。”

“现在干什么？”

“还不照旧是赶伙儿。”

“生活不坏罢。”

“过得去就是。在这里混着不会有什么出息。不象你老做的发财生意。”

“笑话了。我是当学生的，还拿了家里的钱来花，不象你们是劳动的。你们现在每月能赚的多少？”

“马马虎虎。我资格老些，每月关饷，是二百块俄洋^②，

① 现通译明斯克，是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首都。下同。

② 指卢布。

他（指青田人）是一百多块。”

“二百块俄洋，照这里的兑换价，就合上中国洋四百元，不算坏了。”

“那还不是一手来，一手去吗？在这里花费太多，不会发财的。”

“你们都有了家室吗？”

“都有了俄国女人，但那里能算得家室，玩一玩就是了。”

“有多少华工在这里？”

“不大清楚，大概总有二三千人。你到莫斯科时可以看到。”

“你对于这里的情形，很满意吗？”

“别的倒也没什么。就是不能寄钱回老家。俄国洋是不许带出去的。即使私带了出去，到哈尔滨，俄国洋便换不到钱。”

“你不是已成了苏维埃的人民吗？还要寄钱回国干什么？”

“中国人总是中国人。”

接着他们两人便交谈着，谈的话是一种“切头”，大约是關於一种秘密买卖的，我不大懂得。他们似乎不愿意和我长谈，所以我就停止谈话了。后来我知道在俄的华工生活都不坏，只是个个都不满意，就因为无法寄钱回家去。凡是到国外的，都知道中国工人永不会忘却“老家”，攒下了钱总要往国内寄。甚至在国外住下了几十年，娶了洋太太，生了孩子，他们仍不会丢弃“老家”，所谓“树高

千丈叶落归根”。衣锦归故乡，是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所以欧洲人到美国做工去，便成了美国人，到非洲经商去，便成了非洲人，和本国再不会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却不然，到南洋、美洲去殖民的，住在外国已隔着几代，仍然要把在国外辛苦储积的钱，整千整万地向国内寄去。有些人要以为这是中国民族的特长。但中国人到处被人憎厌，也正因为拘守着这农业社会所遗留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牢不可破的缘故。甚至在无产者的国家里，种族的与国别的歧视已经是完全消灭了，（这一点在俄国可以完全相信。俄国人不但不歧视有色人种，而且看得比自国人更亲切，因为他们是同情于弱小民族的。）中国工人却依旧顽固地保守着他们的观念形态。他们虽然已成了解放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却仍保持着数千年来农业家族社会的原始头脑，革命与阶级斗争，他们全然不会了解。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莫斯科车站

清早醒来，车已快到莫斯科了。铁路两旁渐渐看见许多建筑房屋的木架。到了莫斯科近郊，在建筑中的房屋愈多，有的是在建造工厂，有的是盖着工人住所。大概是五年计划的建筑设计的一部分罢。除了这些已落成未落成的新建筑以外，到处便只是一片冰雪。我来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莫斯科乃至俄罗斯的北部，整个埋葬在白雪底下。早晨的微弱阳光，从雪地上面反射，闪耀着眼目，

风景却是梦想不到的美丽。

在我将从巴黎出发以前，很早我就想了种种方法，请求驻在巴黎的苏联总领事，准许我在莫斯科停留一星期。巴黎领事署说是作不得主，便替我拍电去问莫斯科政府，可是莫斯科的复电只准许通过，却不许停留。所以我只办了个过境护照，在莫斯科下车停顿是早已绝了望的。不过从俄国西境到西伯利亚的列车，照例要在莫斯科停车八小时。我想利用这非常宝贵的八小时，看看赤都的大概情形，所以在出发以前，就写了几封信给莫斯科的世界语同志。在以前我并没有和俄国的世界语同志通过信。这次我是从工人世界语的团体的年鉴中，随便找出几个地址，寄信去，告知我到莫斯科的日期。果然，正如我的预期，车进了莫斯科站时，远远已看见两个女同志手挥着小绿星旗^①在迎接着。一位是在中央邮政局工作的R女同志，另一位是在她的同部练习工作的少女。下了车，进了车站，又有两位，N与L同志（请读者勿生误会：对于苏维埃人民如称“先生”或“女士”，便是一种不能饶恕的侮辱，所以我在本文里，只好依着他们的习惯，称为“同志”或“女同志”，虽然俄文的Tovarisch，世界语的Kamarado，译作“同志”是很不确切的。）也在等候着。异国的世界语同志，初次见面时，照例是和见了家里人一般的亲切。中国人讲着世界语来到苏联的更是不常有。所以他们见了我也就和我见

① 世界语的旗帜，绿色象征和平。

了他们一样的欣喜。R女同志便问我在莫斯科能住几时，我说午后就要动身走。他们都说，在这里只停七八个钟头是看不到什么的，如要看看，至少也得住上十天五天。我就说了因护照办不成虽想停留而亦不能停留的原委。于是N同志与R女同志提议和我同去向莫斯科当局交涉，会得到停留的准许也未可知。我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接受他们的提议了。

他们也不很熟悉请求停留的手续应该怎么办。于是先引导了我到车站内O.G.P.U.^①的办公室里去询问。一听到了O.G.P.U.这名称，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不是在西欧一般人所称为神出鬼没、狡诈残酷的苏俄政治警察机关吗？可是一到了那里，我便大为失望。O.G.P.U.的办公室，原来是空空的，中间只有一张破旧的长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机，几本破烂簿册。桌旁坐着一个着黑色制服、腰系手枪的人，正在低着头写字。我们进去后，那人就起立招呼。N同志代我说了原委，那人就打了几个电话，随后向我们说，应该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去交涉。于是我们便辞了出来。假使在西欧，有人知道我曾去过莫斯科的O.G.P.U.，他们不会相信我还能生还的！

① O.G.P.U. 1922—1934年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英文译名的缩写。

奇 景

出了车站，在车站门前的广场上，我便看到了奇景。

因为这时候正是冬日，一岁中最寒冷的季节。冬日的莫斯科真有着生长在温带、热带的人们所梦想不到的奇景哩！这是一片银世界。大地整个的被白雪笼罩着。建筑物和电杆木都披着缟素。飘扬在车站顶上的赤帜，交叉在广场上的红色标语带，格外显出些威风。微弱的太阳光照在雪地上，柳絮一般的雪花却在空中飞舞。这是可惊的美丽的景物，是风景画家所不易找得的题材。据说莫斯科过了十一月后直到三月为止，几乎天天飞着雪花，但也天天见着太阳。生活在西欧的人，冬日被昏黑的雾气包围着，不易见到日光。生活在南部的人，又整年是烈日当空。在这里的冬日，却有着和别处全然不同的景色。

冷可是冷极了。温度总是在零下二十到三十度。在街上是不能驻足的，因为朔风吹来，是刺刀样的尖利。街上的人们都披着茸茸的皮大衣，除了面部以外全用皮毛紧紧地裹着，脚上都着了胶皮的靴套。有了这些御寒的工具，也还是冷到不可忍耐。可是空气却很清冽，使人精神格外地振作。

R女同志和我说：这几天莫斯科正在举行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二十五周年纪念。二十五年以前的今日，天气也是和现在一般严寒，当时莫斯科罢工工人，和军警对抗，在露

天死守到二十四小时，全不退缩。革命的热情，竟把寒冷冲散了。还有那年^①列宁去世，恰巧也在这最寒冷的时节。莫斯科几十万的民众，都去向列宁的遗体行最后的敬礼。因为人太多，许多人要在露天站立十余小时，方才能够挤到列宁的身旁。R女同志是亲自看到的。当时满街站着的人，都已兴奋到忘却寒冷了。

电车上的斗争

我们在广场上搭了电车，去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城内公共交通只有三种车辆。第一是汽车，价很贵而且车很少，不易雇得。第二是在雪地上拖着的马车，因为没有车篷，坐着很冷，所以大多是载货的，很少载人。第三种是电车，却是稳快低廉。票价是划一的，在市内无论远近，买一张十个铜子^②的票就行了。但因为电车几乎是市内公共交通的唯一工具，（听说莫斯科当局今年已决定建造地底铁道，以便市内交通。）所以乘坐的人却异乎寻常的拥挤。我们在上海坐电车往往觉得太挤，但比起莫斯科的电车来，却要算是非常宽畅了。在每一个电车停车处，至少总有五六十人，在等候上车。按照规则，电车只准在车尾上车，在车头下车。但车内总是挤的水泄不通的。你一上了车，

① 指1924年。列宁在1924年1月21日逝世。

② 指戈比。

必须拚命向前挤过去。挤到了车头，你方能下车，否则车过了站，你还是不能下来。第一回坐电车，我全无经验。上车时我请R女同志先上去：因为照着西欧的习惯应如此的。但略略推让了一下，后面的人已挤上去，车开动了，我们都不能上去。等到第二次车来时，才一齐挤上，L同志率领着向车头进攻，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到了车头，不久便到目的地，从人丛中挤下车来。

R女同志便笑着说：“你明白了罢。这便是我们这里的生活。我们这里，生活就是继续不断的斗争。你坐着电车便可以看出我们的斗争的精神。无产者只有向前斗争，决不能向后退让的。如不走向前，你便落伍了。”

莫斯科苏维埃

我们到了莫斯科苏维埃，这是莫斯科的市政府，全市的地方行政事务，全在这里办。关于外人入境出境的护照签字，在这里另设着一个专部。苏维埃的房屋很老旧，大概是从前官署改的。入口处有两个卫兵，但对一切往来的人全不查问。我们在门口脱下了大衣存放着，就到了楼上办公处。办公处的布置，和平常银行的柜台相似，分着几个窗口，分别办事。一切情形和我们在英、法的市政厅所见的差不多。只是柜台内坐着办公的，女职员较多，态度和藹，少一些官场气。在办护照签字的那一部分，我遇见了两个中国工人，也在办出境护照的交涉。

我的同伴，代我向办事人问了一下，方知是应该向一位主任请求。于是，我们进了另一间屋子，去见那部分的主任。L同志等便向他说了许多话，表明来意。那人起初还不肯，后来伴我去的人，再三和他交涉。我全不懂他们的话，大约是说莫斯科世界语会要请我演讲，所以非停留不可。后来那人把我的护照留下，我们便兴辞而出。

出门时R女同志很高兴地向我说：

“好了，好了，现在你已得到在莫斯科停留七天的准许了。”

D 同志的家庭

出了莫斯科苏维埃以后，我们便分了道路：R女同志去火车站，代我取回行李，并退回卧车票价。N同志陪伴着我，去会见苏联世界语同盟的总书记D同志，并商量食宿等事。

D同志是工程师出身，共产党党员，有一个时期，曾任过政府要职。现在是担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工业报主笔，V.O.K.S.（对外文化宣传委员会）^①的委员。他又是个世界语运动的先辈，在欧战以前，他已是一个著名的世界语学者。革命以后，世界语得为现政府所重视，有不少地方是依靠了他的力量。目前他是全俄世界语运动的

^① 现通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下同。

领导者。但因为他和国际工人世界语会领袖（法人）个人意见冲突的缘故，致使苏联世界语运动与国际工人世界语运动中间，发生了裂痕。到了最近，普罗的国际世界语组织，也和国际工人体育会一样，分成了第三国际与非第三国际的两派，这是很可惋惜的。

到了D同志的家，主人已在等候着。D同志的家庭，就我在莫斯科所见，要算是最富裕的。房屋是一间卧房，一间客室，和一个小厨房。客室里的装饰，算不得十分华丽，却是足够舒适，有沙发椅，有无线电收音机，有留声机架，有名贵的油画。木器全是上等的。虽然比之于西欧工人家庭，这样的装饰，不算是奢侈，但以后我在莫斯科看到过的几个家庭，都没有象这样的阔绰。满屋的书架，装满世界语的书籍。据D同志自说，各国世界语的出版物，不论新旧，凡是重要的，都在这里了。原来这是费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搜集成的。D同志的夫人是一个娇小美貌的少妇，装束也颇入时。即使走到巴黎的交际社会里，也不会觉得奇怪。据她自说，从前也曾到过巴黎，所以能说得漂亮的法国话。这样的女子，我在莫斯科，也只有见过这一个，此外我所见的少女（外国旅客不算），全是不加修饰的。后来R女同志附着我的耳说：“你看，D同志的家庭是有些太象布尔乔了。”

和D同志谈了许多话，大半是关于世界语的。他因知道我是从法国来，所以问了我许多关于国际工人世界语组织的事，并探听我个人的意见。我也问他俄国政府对世界

语的态度。据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政府对世界语是不大同情的。因为俄国革命领袖都是多年流亡在国外的，他们大多学会了二三种外国语，所以不感到世界语的需要。列宁夫人并且在《Pravda》^①报上撰文反对世界语。所以当时世界语运动的进行颇困难。后来经过了许多次论争，到现在政府对于世界语，只算是取中立态度，也不反对，也不提倡。各地的世界语会却可以自由活动，从事宣传，政府不加干涉。但现在政府发行的邮票明信片，却有许多是把世界语和俄文并列。又国家设立的无线电播音台每星期总有几次用世界语播音。V.O.K.S.也刊布了许多世界语文件，以供国际宣传。所以和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政府还算是能帮助世界语运动的。

住 宅 荒

不久，他们便替我安排食宿等事。D同志说，在无产国家作客，和在别处情形是不同的。假如你到柏林、伦敦，或随便那一个欧洲大都市去旅行，你可以随便住旅馆，上饭馆，一切待遇和本国的旅客一样。但在莫斯科就不然。外国人来苏联旅行的，要是劳动者所推的正式代表，在这里是当作上宾相待，一切都非常便利。此外凡不是以劳动者代表的资格来俄国的，一概被看作布尔乔。布尔乔的旅客，

^① 《真理报》。

在这里是一样的欢迎；不过旅馆和膳食的费用，格外定得贵些。这叫做“剥削剥削者”。“亏了这样，去年一年中，我们才从美国旅客身上，赚得了一百万美金，这数目便已足够购五千辆的耕种汽车，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不无小补啊！”

但因为我是一个不寻常的客人，D同志答应特别替我设法找寻廉价的旅馆。这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他接连打了十余个电话，又托N同志和D夫人出去交涉，闹了半天，直到黄昏，仍然找不到一间住房。各处的回答都是说客满。原来在莫斯科找住所本不容易。莫斯科的人口在一九一四年还只有二百万，到革命后骤然增加到三百万。虽然最近几年中，市内及郊外新建了不少的工人住宅。可是房屋的建造究竟没有人口增加那样快。而且革命后从前贫困无家的工人，现在都得到了相当宽适的住宅。因此房屋的需要骤增，虽然没收了以前贵族皇室的邸第，分配给工人，也还是不够。许多工人只能住在狭小的屋内，连地窖下面，都住了人家。在五年计划未完成以前，莫斯科的住宅真是一个大问题。至于外国旅客，本有许多国立的旅馆，可以安插。但我到莫斯科那天，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开会^①，所有莫斯科的旅馆，全被各地派来的数千名代表占满了。要临时找一间房间，实在没有办法。

^① 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按：胡愈之到莫斯科那天（二十七日），大会刚刚闭幕。

D同志是一个有力者，虽然分头替我设法，仍找不到一个旅馆。我当初以为护照的事弄妥了，就可安心住下，想不到找一个下宿处还有这样的困难。

新闻记者的食堂

D同志夫妇又邀了我去邻近的公共食堂，先吃了一顿午饭。（其实已是午后三点多了。莫斯科一般的习惯，午饭总是在下午一时以后四时以前。许多人是做完一天的工方吃午餐。）据D同志说，莫斯科的居民每天赴公共食堂吃饭，已成了普遍的习惯。在家中自己做饭的，已很少了。因为自己做饭，一定比食堂价贵，而且男女都做工，很少时间能回家做饭。公共食堂大多是合作社经营的，各种职业的人，都各有指定的公共食堂。各人可带客人到他自己的公共食堂里去，却不能随便闯入一个食堂里去吃饭。因为各个食堂的菜大概是相差不多，但定价却互有贵贱。收入较丰的职业者，指定的食堂，是比平常工人食堂价贵。这大概是因每个经营食堂的合作社，向国营批发店购买粮食物品时，价目不一律。在俄国，物价是完全由政府操纵着的。我们去的食堂，是专为报业及新闻记者而设。是收入较丰的职业者，所以价钱比以后我所到过的工人食堂都要贵的多。D同志夫妇代我叫了一菜汤，一肉饼，一俄国特产的鱼卵^①，

^① 指鱼子酱，有红、黑两种。下同。

(据说是讲究的食品，但非常腥臭，我不能下咽。)一糖渍水果，此外是黑面包数片。他们两人也照样吃。D同志共付了四个半卢布。这价钱是比西欧贵多了。

这食堂的建筑很不小，可容四五百人。但每张餐桌都坐满了人，有的还没有坐位，在旁站着等候。送菜的全是女佣。因为这里是知识分子的食堂，所以秩序格外整饬。壁上贴着许多标语，我随手指一条问D同志是说什么。他代我译出，是说：“付小帐给送菜的女同志，那便是侮辱女同志。”可见在俄国小帐虽已革除了，一定还有些人愿意拿一些小钱去巴结女同志。后来有一次我到车站去寄放行李，那行李房的工人，也向我索取几个铜子的额外小费。资本主义社会所遗留的习惯，虽是极细微的，也不易根本破除呢。

艰难的过渡期

从公共食堂出来，D同志到大学校上课去了，D夫人伴着我回家，拿出了茶和水果请我吃。一面再打电话去找寻寄宿的旅馆。依着电话簿上所有的旅馆全去问过。大多数的回答是“没有房间。”有几家的回答是说：“房间是有着一两间，可是太脏了，断不能给外宾住。”只有二三家说，现在是没有，要到六七点钟，也许有空的屋子也未定。因此只好再坐着等候。

已快到了黄昏时分了。暮色笼罩着莫斯科全城。从壁

上的无线电收音机，发送出清脆柔和的音乐，慰安着方才从工厂中出来的劳动的人们，洗去一日间的工作的疲惫。夜已到临，人们准备着休息了，而各处旅馆还是杳无消息。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我便感受无家可归之苦，R女同志也回到D家来了。她冒着寒冷，各处奔走着，替我办好了行李和车票的交涉。因我还未找得宿所，也代我焦急着，而且向我深深表示抱歉。她说：“在莫斯科住宅的困难，是一切未到过这里的人所想象不到的。要是你到外省去旅行，即使找不到舒适的旅馆，同志们都愿意让出他们的家庭的一角给你住宿。可是在莫斯科却毫无办法。莫斯科的工人们，各人只分得了一间屋子，大多数的家庭都只有一只床铺。所以虽然一般都是非常富于待客热情的莫斯科人——这个你以后可以看出来，——也无法把客人留在他们的家中。要是五年计划成功后，你再来莫斯科时，找寻住屋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困难。现在是只好请客人原谅了。”

幸而D同志从学校里回来了。在旅馆里找房间已经绝望，他便问我愿不愿意暂时住在公共宿舍内。在公共宿舍内是许多人同住在一个房间的，不象旅馆里一个人可以占一个房子。他恐怕我不愿意。其实我已倦怠极了，只要有只床可以过一宿就好，顾不得什么。而且在公共宿舍内，过的是团体生活，比在旅馆关起房间门一个人独住，更有意思，我自然乐意接受的。于是D同志又打电话问了二处的公共宿舍，都还有空出的床铺。一处是在中山大学的中國学生宿舍，一处是无产者旅行社的寄宿所。在他们看来，

似乎中国学生宿舍更适宜些，因为在那里有着同国学生，可以做翻译，许多事情都方便些。于是便由R女同志陪伴着，去找寻中山大学的宿舍。

出门到了街上，白雪扑面，寒风刺骨。寒冷到忍受不住。R女同志怕我冻坏了，用她的皮大衣裹着我，夜间莫斯科街上行人稀少，我们急匆匆地走着。不一會兒，已到了中山大学宿舍的门前。我以为今天晚上可以安憩了。叩了几下门，从门旁的小窗探出一个人头，这是宿舍内的看门人，问我们来作什么。R女同志用俄语说明了原委。那看门人便问有没有中大的入学证，我们说并不是来作学生的，只是来求一宿，所以入学证是没有。那人便说这里只给学生住，却不能收留校外的人。R女同志再三和他交涉，说刚才电话中他已答应留下床铺了。那人说这是出于误会的，争论了许多时候，仍不肯收留。我们站在门外，冷的发寒颤。要求让我们进里面休息数分钟，也不答应。结果是R同志把那看门人骂了一顿，我们只好再踏着雪，走到远处的电车站，搭着电车去找寻另一个寄宿所。

在到电车站去的路上，我在雪地上滑跌了一交，R女同志忙扶我起来，手挽着我，踉踉跄跄地走着。雪越下越大，寒带的朔风，迎面吹来；肌肤僵痛。那天我从清早起来，没有片刻休息，疲惫到万分。直到这时深夜，还在莫斯科街上踽踽凉凉地走着，还不知道今夜在何处下宿。第一天到莫斯科，便吃了这样的苦，要不是后来六天的生活，使我十二分满意，我真要后悔这一行的。但看着R女同志

在旁边一同走，却又不免感愧交加。她为了我整整奔走了一天，而且独自去火车站替我办了半天交涉。到此刻不但毫无倦容，而且一路抚慰着我，象母亲抚慰着小儿一般。在电车里，她温和地说：“你在巴黎、柏林那样的大城市安逸惯了，到了这里，一时会感到不舒服罢。其实现在的莫斯科，物质的困难，可以说大半解决了，只有住宅恐慌，使你受了些苦。要是你在十年前，内战饥寒的时期，来到莫斯科，那时你才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苦呢。社会主义现在是正在诞育中。一个小孩产生，都要经过分娩的痛苦，产生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新社会，新秩序，怎么能不感到困难呢？但是我们苏联人民却甘心忍受着这些困难。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精神的快乐，足以抵偿物质的困难而有余。”

R女同志的话是有理的，就以后我在莫斯科所得的经验。

寝室内的欢迎会

到了福金街（Fokin Strato）二号，扣门进去。于是我得救了。

在大雪中奔走了三点钟骤然进了温暖的室内，虽然只是简单的工人的住所，在我已如进了皇宫一般。尤其是第一次见着我时，宿舍内人们的和蔼的笑容，使我从内心里感到无量的温煦和愉快。

宿舍的办事员，引导着我进了寝室。满屋子的人大多已睡在床上。R女同志替我介绍了一下。这宿舍的旅客多是从乡间来的，很少见过中国人。闻知我从上海来，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室内的一大群天真的小姑娘——从南俄克里米亚（Krimen）岛来莫斯科参观的女学生——都喜的不想睡觉，一个个都披着睡衣起床。这样便在寝室内开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他们要求我报告一些中国的情况，并七嘴八舌地问了我一些中国的事，以及我在欧洲旅行中的见闻。R女同志用世界语作了我们中间的翻译。那克里米亚学校的女教师，向我致了简短的欢迎辞。中间有一个犹太人说了几句犹太语，一个鞑靼人说了几句鞑靼语，都表示欢迎之意。大意是如此，他们都是东方或亚洲弱小民族，在革命以前和中国民族处着同样的地位，现在他们是自由了，却对着正在解放斗争中的中国民族表着甚深的同情。接着一群十七八岁的克里米亚姑娘唱了一曲南俄的民歌。最后是大家站在床前大声欢呼，声音震动寝室的四壁，惊破莫斯科夜半的静寂。

我忘却了刚才的寒冷，忘却了一日间的困顿。我兴奋了，我感动到下泪。饱吃了一顿茶和饼干后，我便倒在床上睡下。这一晚我有着一生中少有的甜蜜的熟睡。

克里米亚的女学生们第二天午后便向列宁格拉^①出发了。分离前她们还要求我和他们合拍一个照片，留作纪念。

① 现通译列宁格勒。下同。

无产者旅行社

现在我把无产者旅行社的内部组织和这公共宿舍内的日常生活，在这里说一说。

苏联政府对于国内的旅行事业，尤其是劳动者的旅行事业，特加深切的注意。国家经营及补助各种旅行机关，减轻劳动者的旅行费用，以求国内旅行的普遍与发达。不单象别国政府那样，想从旅客数目的增加以谋铁道运费及财政收入的增益。除此以外还有更广大的目的。苏维埃联邦的领土包含欧亚两大陆的大半部分，从北冰洋岸直到黑海，从太平洋岸直到波罗的海。在这中间，人种、宗教与语文，又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广大的帝国不但为一般外国人所不能明了，便是苏联人民也不易相互了解国内各地的情形。但社会主义的建立，必须先谋一般人生活的整齐化，集体化。在这广大的复杂的领土与民族中间，求整齐与集体化，是非常困难的。这只有使各地的人民多得旅行的机会，常能和远处的人民相接触，方能改变各个特殊的生活方式，以渐归于整齐。此外农民与工人、乡村与都市的隔膜，为社会主义建设上最大的障碍。苏联政府竭力使工人有到农村去旅行的机会，又使农民有到都市去旅行的机会，便是为了要打破这重壁障。

苏联国家经营的旅行机关，最大是Intourist，是专为招待外国人的。这国营的旅行社在全世界各大都市都设有

支社，凡游俄的旅客，护照、车票、船票、旅馆、膳食一切都可委托他们代办，非常便捷，只是费用收的颇贵。至于无产者旅行社（Proleta Turisma Unuigo）则性质不同，乃专为苏联内部的劳动者旅行家的便利而设的。是一种合作社组织，但有国家津贴，收费甚为低廉。在全国各地都有无产者旅行社的公共宿舍，专为各地旅行的劳动者而设。在莫斯科市内，据说有十余处。我住的福金街二号，便是此种公共宿舍之一。

这宿舍的内部构造，和平常中下等旅馆差不多。不过旅馆有着单人或双人房间，在这里只有总间，每一间内放着十二只到二十只的小铁床，和医院的三等病房一样，设备非常简朴，但收拾得颇为清洁。男和女有时在一个房间睡觉，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另有一个大房间是写信和阅读书报的。饭是在楼下食堂吃。每天三顿。早餐茶和面包和鸡蛋或鱼卵，午餐汤和肉和果酱；晚餐汤和鱼卵和布丁。房钱每天是一卢布十科贝^①。吃饭先付钱买票，凭票到食堂自己端的，每天三顿只费一卢布半，这比在新闻记者食堂的价目便宜多了。

既然是劳动者的宿舍，所以只有管事员，没有侍者和“仆欧”^②。床要自己动手叠，菜要自己到柜上去端，洗脸是在一个盥洗室内用冷水冲的。这些在过惯穷学生生活的我，

① 现通译戈比。

② 上海的外国人过去通称服务员为“仆欧”，即BOY一字的译音。

并不觉得有什么困苦。在我觉得更方便的，是可以不拘礼貌。在西欧的布尔乔的旅馆内，你要衣冠整齐方能上食堂，还有种种繁琐的礼节。在这里一切都毫无拘束，衣服歪斜些不要紧，高声谈话也没人干涉。大家都象一家人，过的全是天真的朴素的自由的生活。

我在这一星期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团体生活的乐趣。在这里大家的生活是齐一的，同样的睡觉，同样的吃饭，全没有贫富高下的分别。各人都显出十二分的满足和愉悦。各人都觉得别人的生活全和我一样，因此计较心和羡慕心完全消失了，大家就同自家兄弟一般。这种集体生活的快乐是住居在巴黎、柏林大旅馆内的阔客所梦想不到的。

几个同居者

但我在这里却是被特别看待的。因我是一个不平常的客人，又是从远道来的，所以管事员和同居的旅客，都把我另眼相待。他们让我睡在靠近火炉旁的一只床上。吃饭时我不要吃的菜，他们特别替我换了。茶是吃双份或三份的（钱仍只出一份）。同居的人每晚都拿出点心来请我吃。这样的优待，在我反感着不安了。

在我的床对面睡的是一个高加索人，一个又高又大颇象蒙古人脸相的人。据说是来莫斯科开会的农民代表，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都和我讲话，我一句也不懂，但从他那

诚挚恳切的表情，我已明白了大半的意思。后来他在列宁的相片的后面，用阿拉伯文题了几行歪歪斜斜的字，送给我当作纪念。他那副天真的可掬的笑容，至今还反映在我的眼帘。除他以外，在这宿舍内还住着好几位从东方的苏维埃国土来的旅客，可惜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哑巴，不然一定能从我们的对话中，找出许多有趣味的材料。

在宿舍中只有一个从邻省来莫斯科旅行的机器工人，还能勉强和我讲几句英国话。后来的几天，去参观工厂，他陪了我一同走。他曾在美国住过十七年，在福特汽车厂也曾做过工。两年前方回俄国。我问他在美国做工，和在苏联做工比较如何。他很干脆地答说：“在美国当然可以多赚钱，但在苏联却可得到精神上的愉快。”他又说，据他两年来的经验，他是再不想离开苏联了。

我最不能忘却的是宿舍内一位管帐的姑娘。是一个娇小而又干练的女子，年纪还不满二十。宿舍内大半的事务都由她管理。见了无论那个客人，都爱开几句玩笑。这大概可算是典型的苏维埃少女罢。有一天，她指着手指上的戒指，问R女同志这是什么。R女同志便说这是我的结婚戒指。于是这位管帐的小姑娘便弯着腰笑个不止。我问R女同志她笑什么。R女同志才说，在苏俄是没有人戴结婚戒指的；夫妇间的情爱，要用金属的小环来作保证，这样的事现代的少女已看作是一件大笑柄了。

五日休息制

因为第一天太疲倦了，第二天早晨醒得很迟，同屋子的人都已起床了。壁上的日历，红色的一页已揭去，换成了黄色的。上面写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几个大字。我们知道俄国正在进行历法革命。但关于一般历法的改革，还正在考虑中。现在用的历，还是和各国通行的历一样，只是星期却已废除了。自从五年计划实施以后，劳动者每隔四天，休息一天。休息日各人不一样，是轮流着休息的。因此工厂的工作是整年不停的，工人的工作日，却比从前减少了。星期的名称完全消失。大家都已忘却那一天是星期日。这种办法给予宗教信仰者以一重大的打击。因为星期本是从基督教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①。对无神论者的苏联人民，本来用不到这种七日休假的制度。现在日历大多是用五种不同的颜色来分别日期。例如第一天是红，第二天是黄，第三天是绿，第四天是橙，第五天是青，第六天又是红的。每个工人也依休息日的颜色分班。例如红色日休息的工人，只要看到日历上的纸是红色的了，他便可以休息一天。此外可以类推。这种方法除上述的优点（反宗教，增加工厂工作，减少工人的工作日）外，还有别的好处。

^① 据《旧约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用了六天的功夫创造了天地和万物，定第七天为安息日，即星期日。

在别国行星期制的，每到星期日或星期六日，各处的商店，戏院，游戏场，必拥挤的不堪，而在平时则顾客寥寥。行五日轮流工作制后，便没有这样的弊病。此外在统计预算上也有不少的便利。

可是当这种新制度采行的开始，听说也颇感到一种困难。因为轮流休息的办法，往往使一家人不能有一个共同休息的日子。例如一家五人，在五处工厂做工。父亲被派定红日休息，母亲黄日休息，女儿绿日休息，大儿子橙日休息，小儿子青日休息。这样父子母女整年都不能在一处游玩，一处休息。这根本是把家庭生活破坏了。在苏维埃联邦，虽然一切都向社会化、集团化的方向走去，不但没有把家庭生活看作“良风美德”，而且因婚姻制的改革，离婚的便利，妇女的经济独立，公共育儿室、公共食堂的扩张，家庭已有日趋崩溃的形势，但是在目前，劳动者大多数还保持着家庭的习惯，所以在五日休息制初行的时期，颇感到许多不便。但后来经政府竭力推行，并于分派休息日期时，注意实际情形，在可能范围内，依工人志愿，以决定其休息日。到现在五日制已成了一种非常便利、毫无窒碍的制度了。

盲诗人的消息

早餐后，走到街上买了一份英文报《Moscow News》，仍回到寓所一边读着，一边等候R女同志。因为她约着今天

向邮局请了假，来陪伴着我去游玩。实在，如没有她陪伴着，我便成了聋哑盲人，不懂得一句话，不认识一条路，偌大的莫斯科，我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啊。

直等到下午一时，R女同志才来寓所，我们便出去先到车站取出了一些行李。随后同到苏联世界语会总事务所，请求那边的同志介绍了去访问V.O.K.S.（苏联对外文化联络会）。在苏联世界语会内，遇见五六位世界语同志，并且得到了七八年前来中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①的确实消息，这使我得到意外的喜悦。因为当我出国的时候，从日本方面得到消息，说这位不幸的诗人已经死了。我不敢相信。在法国，我用了种种方法，托在俄友人设法探听，可是不曾接到过一个确实的答复。这一次，我在莫斯科世界语会遇到一位爱罗先珂的朋友，才知道盲诗人好好地活着。后来我遇到幼年时教他世界语的老师J同志，也得到同样的报告。据他们说，爱罗先珂不但没有死，而且比以前更愉快康健。他的兴趣非常好，和以前一样的“干着使我们明眼人惭愧的事”（J同志说的）。在前年去年的暑假，他都到堪察加的北冰洋面上，坐着破冰船去探险，这几乎是不能使人相信的。在以前的几年中，他都在莫斯科当日文翻译和教师。要是我来莫斯科早了五个月，还能和他见面。现在他是在乌克兰的一个盲童学校教书，离莫斯科有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可惜路太远了，我不能去看他，不然，我

^① 爱罗先珂(1889-1952) 苏联著名世界语作家。

可以和他诉说七八年来的别情，而且可以知道他最近的生活感想。无论如何，我相信他现在不会象在北京的时候那样，天天嚷着住在沙漠中的悲哀呢。

到莫斯科世界语会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到V. O. K. S.去已太迟，所以约定了明天再去。R女同志说，福金街二号今晚有一个盛大的集会，她和我都被邀请作客人，所以我们必须早回去。因此我们只在街上走走，买了些零物，便回到寓所了。

煤油、盐、面粉和傻子的故事

在街上，经过了一个广场，现在是把这地名忘却了。在那里是用绘成色彩的木板，制成整队的兵士、工人、机关枪、步枪等半面的雕像。形式如新派的戏台布景。据R女同志说，今年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二十五周年纪念，这几天刚过了纪念祝典，在二十五年前，政府军队与工人曾在此处巷战，相持数日之久。现在广场上陈列的，便是当时血战的实况。

在莫斯科街上的商店，尤其是大商店数目非常少，而且这些商店全没有明显的市招和诱人的Window Show^①，因此使莫斯科街市，显出与其他世界大都市的街市完全不同的面目。在革命后的莫斯科，只有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初期，私人商业曾经繁荣过一时。但现在私人商业几乎完

① 橱窗陈列。

全消灭了。只有在偏僻的街巷、火车站旁，还有些投机的小贩，从乡间运来面包及糖果，在地上摆着摊贩卖。此外一切批发零售的商店全是国营，或由合作社经营的。平常日用品的商店，是分区或分业设立的。住居在每一区域，或每一种职业的人，都各有指定的商店。除了糖果玩物等不重要的物品，可随意购买外，一切日用必需品，必须凭券购买，各人都有限制。这券又分成五个等级，对于第一级，即小孩与老人，购买限量最大，其次为体力劳动者，再次为公署及机关职工，再次为自由职业者，限量最少者则为教士、前贵族资产阶级及一切不劳动者。

在未来俄国以前，我据许多经过俄国的人报告，都说莫斯科的商店都非常拥挤，每家店铺的门口，都有数十百的顾客等候着，主妇须从早晨等候到傍晚方能买得一块面包。我在莫斯科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每家店铺门内都挤满了人。有几家门外排成了很长的“尾巴”。据说近来已好多了，在数年前商店买客还要拥挤的多，这是因为商店数目少，而凭券购买每次有限量、不能多买的缘故。但不是这样，便不能防止投机，这自然是过渡期不可避免的困难。

经过了一家煤油店铺的门口，门前的“尾巴”特别长，从街头起一直接到街尾，大约两三百人，都是不作工的老人或管家妇，手提着铅罐或油瓶，在等候着。我便问 R 女同志，苏联不是产出很多的石油，而且每年大量地输出国外吗，为什么煤油店铺的门前有这么长的“尾巴”？

“俄国的石油多，但是俄国傻子更多，” R 女同志回答

说。

她继续着说明。她说俄国的石油是尽你怎样用也用不完的。但有的傻子会相信谣言，恐怕买不到石油，都争先恐后地去买来藏在家里。因此石油店铺的门口，便挤得水泄不通了。她说，有一次，莫斯科忽然起了一个谣言，说是国营商店的盐快卖完了。于是全莫斯科的管家妇都挤到店铺里去买盐。俄国的盐当然不会缺乏的。但盐是随时从海滨运来，在莫斯科贮存的数量不会十分多。假定每人多买了半基罗格兰姆，莫斯科三百万人口，一下子便多买了一百五十万基罗格兰姆，自然不到两天就卖完了。第三天莫斯科真的买不到盐，于是便起了极大的恐慌与纷扰。过了四五天，大批的盐从海滨盐厂运来了，大家才知道是“庸人自扰”。

“我再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R女同志笑着说：“我们邻居有一个老年妇人，是在纱厂做工的。有一天，她和我讲，她遇到一个大困难，就是家中的面粉太多了，堆积了半间屋子，没地方去贮藏。我问她为什么会藏了这么多的面粉。她说是三四年来的积存起来的。原来她的粮食券上规定，每五天可以买一基罗格兰姆的面粉，预备人家做糕饼点心的。但她只是孤身，平时就在工厂食堂内吃饭，从不做点心，可是每隔五天，她一定去买了一基罗格兰姆的面粉，放在家里，积了三四年，就堆满半屋子了。于是我劝她：面粉还没有用，以后不要再去买了罢。这位老妇人便说那可不行，因为这一基罗格兰姆的面粉，是写在券上的，

是她应得的权利，权利是断不能放弃的。你想，这样的傻子，你能在别处找到吗？”

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

回到福金街二号，已经是午后七点了。在我们的寓所的楼下的大礼堂内举行的旅馆劳动者的大会，便即开始，我和R女同志都以来宾的资格被清出席。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比较莫斯科和列宁格拉两地旅馆业劳动者生产竞赛的结果。我从R女同志和大会主席某君的说明，方才明白了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的理论与实际。

劳动者的生产竞赛，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冲突的。一般布尔乔的理论家，攻击社会主义，都说社会主义一旦实行后，个人的竞争完全消灭，人类进步必将停止。因为物质利益为一切人类活动的唯一动机，社会主义者既反对一切为个人利益的竞争，则人类必相率游惰苟安，社会将日见退步。这种论据初看是很近情理，但在实际上，却完全不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并不否认物质利益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并不否认人类的竞争心、好胜心为社会进步的要素。不过对于竞争心、好胜心的如何利用，却与布尔乔的观点全然不同。布尔乔虽主张个人自由竞争，但在布尔乔社会中，只有资本家与资本家可以互相竞争，无产者却始终处于奴隶的地位，绝对没有为个人利益而竞争的可能。在马克思主义者

看来，唯有在阶级的统治消灭以后，人类方能有平等的机会，自由发展其个性与才干。又布尔乔社会的竞争是完全自私的，为个人利益的。大资本家压倒了小资本家，使小资本家成为无产者，永远沦于奴隶的地位，无所谓怜恤与同情，这是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必然的局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不然。个人对个人的掠夺既完全消灭，各个人都为了社会全体福利而竞争生产。这竞争的结果，并不专为个人利益，却使全般生活标准提高，因之能力弱小者与能力强大者同样蒙其利益。竞争愈烈，则一般人的物质生活亦愈提高，这样方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竞争的真义。

在布尔乔社会，人都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生产，绝不顾及全体的利益。例如加拿大的富农，因为要抬高麦价而焚烧大批存储着的食粮，却不想到世界上有着无量数嗷嗷待哺的饥民。又如资本主义国家厉行产业合理化而不顾到大批工人将因此贫穷失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不然。人为了社会全体的利益而生产，但社会全体的利益，仍是各个人的利益，所以一切生产的增加和改良，是于整个社会有益而于任何个人都无伤害的。以此为目的的生产竞争，方是公平的合理的生产竞争。

在苏维埃联邦，革命的初期，工人和农民，大多数还保持着布尔乔社会的传统观念，以为工厂与农场收归国有之后，一切的生产物，既全属于国家，所以个人不必为生产而努力。在革命初期生产力的减退，工农业的衰颓，成为普遍的现象。后来经过数年的宣传训练，劳动者开始明

了他们是为公共的利益也是为自身的利益而劳动，一切生产增加，唯一的享受者为劳动者自身，不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增加的生产都装入资本家的口袋，而于劳动者全无利益。因此增加工厂生产率，减低产品成本，在苏维埃国家，乃以工人自己的志愿、工人自己的努力来企图。为社会全体增加生产，视为工人最大的荣誉。在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又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的运动，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乃是大众直接干涉生产的意思，这是代表苏维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以前，工厂虽属于工人所有，但工人只是支配工厂生产而已。一切生产计划、组织及程序由工人所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及生产会议决定。工厂主任、工程师、技师在生产会议内，向工人提出工作计划，由工人辩论修正，经全体决议后，方将计划实行。在这时期工人对于生产只限于支配。但到了五年计划的时期，单是支配生产已是不够的。第十六次苏联党代表大会宣言，非有大众的积极干涉，五年计划的实现，实为不可能。果然，从这时期起苏维埃经济由工人支配生产的形态，进而为工人干涉生产的形态。最初一部分工厂内的少数青年工人组织所谓“冲锋队”^①，预定某种工作的标准，自告奋勇，以求贯彻。同时并向其他工人竭力宣传鼓励，激发群众的热情，利用此热情以谋生产的增加。这“冲锋队”的员额不久扩充到工厂全部，后来扩充到了别的工场工厂，乃至

^① 现通译突击队。

于全苏维埃的托辣斯。

这些“冲锋队”决不是胡乱定出一个标准，因为这样一定是要失败的。他们是根据了可靠的统计数字，按照他们日常工作的经验，来定一个生产标准限度。大多是由各工厂的代表大会决定。决定标准限度以后，便订下竞赛契约，订了契约以后，到了决算时期，如生产能力能超过预定限度达最高点的，在工人中间认为最大的荣誉，反之如不能如约达到限度的，则视为怠惰耻辱，由工人大会判定名誉的惩罚。

竞赛契约的方式，有由一工厂的全体工人与别一工厂的全体工人互订的，亦有由各个或各班工人相互订定的。个人的生产竞赛，最初是由奈罗福敏（Naro Fomine）纺织厂一个女工所发明。这女工曾经宣言：“我将竭我的能力以提高工作生产率，同时并竭力减少布匹的线纹脱漏，竭力注意织机的清洁保持。我已约定了和我同班工作的几位同志共同加入。”经这位女工的发起，不久奈罗福敏厂约四千名男女工人都加入了竞赛，在短时期内该工厂的生产率提高了许多，产品成本及耗废也大见减少。

最普遍的例则为各工厂的互相竞赛。这是由同业的、或非同业的两方订了契约，在某限期内，增加生产效率。例如Vyberg^①工厂的工人约定减低生产成本超过原定计划所定的数目，约Kamensk^②造纸厂的工人共同加入竞赛。

① 维堡，下同。

② 卡曼斯克，下同。

结果，Vyberg厂的生产成本减低百分之一四·五，其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减低成本只百分之七·五。同时Kamensk纸厂经竞赛结果，造纸成本减低百分之五·七，纸版成本减低百分之一八·三，机器修理费减少百分之二十。此造纸厂工人又约他家造纸厂工人共同加入生产竞赛。不久全体造纸业的成本大大减低。

一切的生产竞赛，都是由工人自动发起，自动决定标准，自动订定契约。这工人直接动员，为增加生产而斗争，是五年计划时期苏维埃经济的一个特征。

政治·劳动·行乐

不单是工厂劳动者，此外机关的职员、文化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农业劳动者，也都用社会主义的竞赛的方法，促成物质的精神的生产的增加，谋一般生活标准的提高。那晚我所参加的集会，便是在苏联常见的竞赛大会之一。这次是莫斯科和列宁格拉两地旅馆业劳动者的生产竞赛。出席的有这两大城市的旅馆业服役者的代表一百五六十人。在这中间有旅馆经理、会计员、侍者、仆役、厨娘、搬运夫等所派的代表。莫斯科无产者旅行社的主干致开会辞。R女同志在我的耳旁把演辞逐句翻译，大旨是讲五年计划实施的情况，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恐慌与苏联工业化急速成功的两相对比，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压迫。他说目前世界无论那一国，都有数十万到数百万

的失业工人，只有苏俄不但没有失业问题，而且今年苏俄工业还缺少二百万名的劳动者，正苦无法补充；单就这一点已足证明社会主义生产方法的优长。最后他又说旅馆业劳动者应该努力增加并改良工作，以促成五年计划的实现。因为旅馆业者看似不重要，实在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厨房的饭菜如烧的不好，滋养料减少，则各地来旅行的劳动者的健康将因而受损，结果一般的生产率，自然因而减低。又如各旅行社所张贴的壁报，内容往往敷衍成篇，绝少精意。这虽然是小事，但来旅行社住宿的，各国的旅客都有，他们读了这些肤浅空洞的壁报，会对苏维埃国家，生出不良的印象，这间接也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所以旅馆业的全体劳动者，都应严守生产纪律，不论大小事务，都应用全部心力去干，方能扫除五年计划前途的障碍。

经过这演说后，大会公推主席团五人，其中一个厨娘，一个是搬运夫。我因为是远客，也被选入主席团，这在苏俄的习惯，是当作一种对公共的客人的敬礼。我想辞却，没有得到许可。于是我起立，向大会表示了谢意，并略说了几句祝贺苏联五年计划从速实现，社会主义成功的话。我受了全场的鼓掌欢迎，不觉面红耳赤。

但被选入主席团后，我不得不移坐到主席台上去，这样便和R女同志隔离的很远，没有人替我翻译，于是我对于以后各人的演说辩论，反不甚了了。大概以后是由莫斯科和列宁格拉两地旅馆业的代表分别报告最近时期的工作

情形和生产增加的实况。有关于一般营业的报告，有关于房屋清扫的报告，有关于厨房的报告。经两地比较的结果，大体都超过了竞赛契约所定的限度，对于各门的生产增加情形，两地的旅馆业劳动者互有短长。随后又由各代表提出关于改良旅馆业务的种种建议，并指摘现在的错失，虽极细小的事件都经过长久的讨论。这样的会议，一直延长到三个钟头。到了晚间十点，方才唱着《国际歌》，宣告闭会。

会议完毕以后，举行宴会，全体的代表来宾一齐列席。菜是比平常特别丰厚，因为在竞赛会议的时期，厨娘们自然格外要显出些手段。不过在苏俄的一切宴会里照例是没有酒的。宴会完毕大家仍回到礼堂，举行盛大的同乐会。在这同乐会中跳舞和游艺的节目相互间隔着。大家经过一顿饱餐后，尽情的游戏作乐，把适才三小时的会议的疲劳，生产竞赛的工作紧张，一时间都忘却了。

游艺的节目，大部分是具有地方民族色彩的。演艺的人大概是预先邀请，或者是请住在旅行社的各地旅客担任。其中有克里米亚的革命歌曲，高加索地方的双人对舞，土耳其音乐，鞑靼的民歌及跳舞。歌舞的人都着了本地特异的服装，光怪陆离，东方色彩，非常浓厚。最后更有一个节目，是朗诵著名无产作家玛耶阔甫斯基(Mayakovsky)①的诗篇。

① 现通译马雅可夫斯基。

每一个节目终了时，夹着十分钟的跳舞，在场的人一齐加入。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并且加入了苏联的民众跳舞。在苏联跳舞艺术也和音乐、图画、雕刻一般，是普罗化的、民众化的，和布尔乔的跳舞艺术完全不同。据说，在俄国，为提倡民众的娱乐起见，由国家开设跳舞学校，聘请跳舞教师。在春夏间，天气较温暖时，跳舞教师常在街上把来往行人拦住，教以新式跳舞。这跳舞不象目前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跳舞那样整齐矜持。本来俄国的民间跳舞，都是一种群体的集团的跳舞，革命后的新派跳舞不过把这种民间流行的跳舞，加以改良而已，最普通的舞，是把在场的人分成男女两列先由女的绕成一个大圈子，拉着手，按着音乐调子左右行走。男的也在圈子外边站着。待音乐停止时，女的一齐向外捕捉近旁的男子，如男子逃避的不快而被捉住时，便被送到圈子的中心，席地而坐，算是女子的俘虏。随后是由男子捉女子，也是如此。这一类的跳舞，会激发大众的狂欢，使你感到群体生活的愉快。比之于布尔乔社会一对对男女各自拥抱着的跳舞，完全是另一种情调。

这样，以政治宣传、工作报告开始的会议，却以大众歌舞欢笑终场。据说，这是苏联劳动者集会的一般的程序。政治训练、劳动、狂欢的行乐，这代表了苏维埃生活的三方面。

标准工人住宅

一月三十日^①午前，去M.N.街，访问V.O.K.S.的总部。今天R女同志不能来，她派了她的第二个儿子R同志来替我引路。R同志是十六岁的少年，在公立学校的最高年级读书，不久快毕业了。今天是校中的假日，所以代替了他的母亲来陪伴着我。他到了我的寓所，和我谈了些关于学校生活的话后，我们便一同出门。

V.O.K.S.是“苏联对外文化联络会”这几个字的缩写，这会的目的是谋苏联和外国学术文化界的联络合作。主要的工作是向国外交换学术书籍杂志，并且已用英、法、德、世界语发行一种介绍苏维埃文化生活的月刊杂志。此外是招待来游苏俄的一切外国文化工作者。会所是前贵族的邸第，建筑和设备都非常富丽而舒适。办事员大部分是女子，能讲英、德、法语和世界语。我会见了主任，索取了一些关于五年计划及苏联文化事业的报告小册，随后又约定了次日由他们派人陪伴，去参观克列姆林、共产党大学和无产作家协会。因为我特别感到兴味的，是在文化方面的设施，所以他们允许介绍我去参观上述的地方。可惜后来因为约期困难，时间匆促，不曾去访问无产作家的团体，会见几个大名鼎鼎的新俄文艺代表，我至今还引为遗憾。

^① 按活动日程应为一月二十九日。

可是凭着完全偶然的机运，当我还未出V.O.K.S.大门，便得认识了一位无产作家U同志。U同志是世界语者，本是来V.O.K.S.访友的，在门口和我们撞见了，他带着好奇试探的心理，用世界语向我问话。当他发见了我是从中国来的世界语者时，便十分的喜悦。我们虽然是不意地相遇，后来却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尽力援助我指导我。我在莫斯科虽只七天的短时间，却窥测了苏维埃生活的种种方面，这一大半应该特别感谢U同志和R女同志他们两位。

U同志是在苏维埃联邦内鞑靼共和国的首都喀散(Kasan)^①出生的，今年还不到四十岁。在革命以前，他是喀散地方的纺织厂工人。一九一七年加入布尔希维党，投身红军。赤白战争中，建立过军功，被任为司令官。内战停止后退伍，开始用鞑靼文写小说，并充莫斯科几家报纸的文艺新闻记者。这样他便成了革命后新兴的许多无产作家之一了。

我问他苏俄文人及智识工作者的生活待遇怎样。他说，一般地对文人待遇并不比普通体力工人优厚。他要是单靠了写小说卖稿，生活不见得十分富裕。可是他除了无产作家的资格外，同时是红军退伍军官，是有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因此他可以享受到许多特权。例如住宅的租金特别便宜，几等于免费。在街上坐电车不必买票，及其他等等。（最有趣味的，是莫斯科电车照规则只许从车尾上去，

① 现通译喀山，下同。

从车前下去，但他凭了红军退伍军官的证书，却可以从车前上去，从车尾下去。)因此他对于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

U同志约了我们去他家吃中午饭。饭后方陪伴了我去参观。他的家在莫斯科城南近郊地方。我们坐了约四十五分钟的电车，下车又步行了约十分钟，方才到他家。这一带尽是新建的工人住宅。每一所的住宅，都占着大约十余亩的地位，都是七层或八层的钢骨水泥建筑，据说是模仿美国式的家宅建筑。外表是灰白色，四周是一大片草地，全被雪盖上了。室内的设备很朴素，但升降梯、自来水、煤气灶、热水汀、电灯、电话，各层都设置齐全。这样的大住宅，在邻近一带有四五所，都是同一样式，都是在这两三年来新建的。U同志指示给我近旁的一所，说是专给聘来的美国专家居住的。此外则是平常工人住宅。每一住宅内，大约可以容纳四五百的工人家庭。据说中国工人也有住在里面的。U同志和我说，同样的标准工人住宅，在莫斯科的四郊，正在大量建造着。在五年计划完成以后，莫斯科的工人的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这新式家宅。这样，住宅恐慌的问题，便可以解决了。

新式的工人住宅，不但建筑的外表是完全一致的，室内的布置设备，也差不多是一个式样。每一个工人家庭，大概占着一间十余平方尺的屋子，窗是向旷地开着。日光和空气在郊外是不愁缺乏的。这一间屋子便当作了寝室、餐室和休息室。另外又有两小间附属屋子，一间是浴室兼便所，另一间是灶房。烧菜是用煤气炉，屋内都有热水汀，

所以很清洁。电话是住宅内各户公共用的。无线电收音机则每家都有一具。房租没有一定的数目。因为国家做了房东，工人按照收入多少来付租金。收入较多的租金付的多，收入少的租金也少了。U同志的住屋，也是照着上述的式样。每月连房租、电灯、自来水、煤气、电话、无线电费，总共是付出三十卢布。这数目照着莫斯科的生活程度，简直只够作零星耗费，等于不付房租。但因为是红军退伍军官的缘故，他才能得到额外的便宜，平常工人所付出的，大约要比这数目更多些。

无产文艺者的“家”

U同志和一位在莫斯科剧院唱歌的姑娘(U同志向我介绍她时，称她叫“姑娘”，“Fraulino”^①)同居着。这位姑娘也是鞑靼人，女子正在二十余的妙龄。服装却很朴素，显出一种健全的天然美。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文艺工作者，所以他们的住屋，除和平常工人住屋一样朴实外，却充满着东方的艺术美的情调。屋子里靠近窗口，放着一只低矮的榻，上面铺着东方图案的毛毡。墙旁放着一只钢琴，此外是几只低矮的小凳，一只躺椅。书籍散满在地上。壁上满贴着五光十色的照片图画。找不到一块空白。进门处靠壁是一只长画几，画几前面放着一张方形的餐台，这陈设

^① 世界语。

有一半象中国旧式家庭的客厅。壁纸和地毯的图案是红绿相间的构成派绘画。初进室内时会使你觉得头脑昏眩。

谈了一回天以后，那位姑娘就到厨房里去烧菜，不久开始午餐。食品很简单，一盘黑面包，每人一盆牛肉菜汤，一大盘糯米做的煎饼。我是爱食甜食的，这煎饼颇合我的口味，据说是鞑靼风的制法。在平常他们很少自己做饭。各人都分头在公共食堂里进餐，今天是为了我特别在家做饭的。

带着布尔乔社会的心理习惯，我不十分明瞭U同志和他所称为“姑娘”的鞑靼女艺术者，中间是怎样的关系。我冒昧地开口问着：

“请恕我无礼的问话，你们两位是不是算做一对夫妻呢？”

“为什么不是？”他诧异地反诘着。

“那末，你们是曾在地方机关注册结婚了罢。”

“不，我们不曾有过这样的形式。在苏维埃国家，只要有同居的事实，法律上便认作夫妇。一旦同居的事实终止，就认为离婚。注册不注册，倒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又有婚姻注册制度呢？”

“在这过渡期，家庭生活还不能完全打破，自然非有婚姻注册不可。在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办理婚姻注册的机关，工作非常的繁忙。因为一般女子，恐怕生下孩子，做父亲的不肯负责，所以都到婚姻注册机关里去登记结婚。但结了婚不久，又去注册离婚的非常多。到了近年，这种事情

渐渐少了。劳动者头脑中婚姻的观念渐渐破除。恋爱的两方既相互信任，而有同居的事情，何必再要有注册结婚的形式？只有一部分的男女，因为注册结婚时可以多购一套新衣新鞋，所以去注册，此外去到婚姻注册所里请求结婚的人却很少了。”

“我向来知道苏俄离婚结婚，只消由本人去注册就完事，这已经是十分自由了。现在连注册的事都渐渐减少，这样不是根本把婚姻制度消灭了吗？”

“婚姻制度的消灭，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目前的苏俄，社会主义虽还未完全实现，但婚姻制度已根本动摇。在现在，甚至男女的固定的长时期同居，也已视为非必要。有许多男女长期同居，大都只是为了住屋困难的缘故。例如我们俩虽然相爱着，但也并没有永远同居一处的必要。不过因为我们那位姑娘想找一所比较安适的住屋，非常困难，所以暂时两人合住着罢了。”

“这样的自由的男女关系，你觉得很满意吗？”末后我还要来一个愚问。

“自然，”他说：“为什么不满意？阻隔着男女两人间的一切物质的形式的障壁，既然都撤除了，这样我们方才有真的幸福的恋爱生活啊。这样的幸福生活，在革命以前，我们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男女关系是解放自由了，但所谓“家”这东西，却因此而瓦解而消灭。宗教与家庭，这在前时代所视为人类文化生活的最坚固的基石的，现在却被十月革命的急流所冲

碎了。典型的家庭生活，至少象托尔斯泰、柴霍夫^①的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家庭生活，在新俄国是已经不能再找见了。

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

与U同志闲谈文学艺术，颇得了一些新的见解。

这是一个很大的Paradox^②：布尔希维克在政治的立场上，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而在文化及艺术的立场上，却又是民族主义者。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对于民族文化、民族语文、民族文艺，能象苏维埃政府那样地提倡保护。（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民族语文、民族文艺，并不是专指俄罗斯文化、语文、文艺。苏维埃联邦的内部包含着数十个不同的民族，而俄罗斯民族不过其中之一。把苏联的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视为一物，这是最普通易犯的而又是最重要的错误之一。）革命以前，在“柴”^③的领土内，一般人只知道有一个俄罗斯帝国和俄罗斯民族。到了十月革命以后，除这俄罗斯民族以外，才发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哥萨克、乔治亚^④、鞑靼、亚尔美尼、Tadjiks, Khirgizes, Uzbeks, Tugcomans, Khazaks, Krimea,

① 现通译契诃夫。

② paradox 英语，意译为自相矛盾的反论。

③ 现通译为沙皇。

④ 现通译为格鲁吉亚。

Bashkiriens, Jakutions, Komis, Karakalpaken^①, 以及此外许多数也数不完, 读也读不清的古怪民族。不但发现了这一大群的民族, 而且更发现了这些民族所独特的文化、语言与文学。在苏联境内, 各种语文都和俄罗斯语文有同样的法律的效力。在我所经过的许多车站, 上面所标的站名, 都有四、五种或七、八种文字并列着。国家发行的邮票、邮政明信片、纸币, 用十余种文字印成。国家印刷局, 用七、八十种文字印刷教科书、杂志、报章和文艺作品。其中有几种文字, 在俄皇时代是从不曾印在纸上过的。

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文学, 如都介涅夫^②、柴霍甫等的作品, 在技巧与思想上受西欧文学的影响很大, 所以是世界性的。反之新兴的普罗文学却是地方性的, 乡土的民族的色彩非常浓厚。在新兴的音乐及跳舞艺术里, 也充满着各种的民歌和民间跳舞的情调。普罗文艺的最大的源泉是民间文艺, 所以她不能不是民族性的。

就举U同志为例罢。他是城市无产者出身, 而且在早年便信仰布尔希维主义, 投身到红军里。他所写的小说, 几乎全部是用赤白战争来当题材的。可是他却全用鞑靼文来写, 而不用俄文写, 虽然他也一样能写俄文, 而且俄文

① 苏联的民族: 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哈萨克、克
里米亚、巴什基尔、雅库特、科米、卡拉卡尔巴克。

② 现通译屠格涅夫。

的作品比鞑靼文的能得到更多的读者，但他却觉得只有用他的乡土的语文，才能忠实地表现情意。据U同志说，在苏联凡是在政治社会思想上站在革命前线的人，对于民族文化、语文的保护，最为固执。例如苏联政府近年曾主张把苏联内部所用的文字，都改用拉丁字拼音。但这个主张至今还不能实现，就只因为几个重要政治领袖坚决反对的缘故。反对的理由，是恐怕改用拉丁字母后语文的形式将丧失其特殊的民族性。

这似乎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布尔希维克在一方面高唱无产者无祖国，而在他方面又要尽力提倡保护民族文化。关于这民族文化的问题，数年前，党内的理论家间，也曾引起过剧烈的论争。尤其是左翼的理论家，反对提倡民族文化甚力，但终于斯大林^①的主张得了胜利。斯大林所持的理由，以为革命的最后目标，固然是创立世界的文化，以代替一切民族文化。但世界文化的产生至少要在世界革命成功了许多年之后。在目前的过渡的阶段内，无产者的政权，只限于苏维埃联邦的国境。这样创造世界文化显然是不可能。而且世界文化的创造，必须在各民族得平等自由发展其民族个性、民族文化以后。从各个自由发展的民族文化，混合结晶方能产出世界文化。目前世界的许多的小民族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无从独特发展其民族文化。所以第一步必须使民族文化解放发展，第二步方能产生世

^① 现通译斯大林，下同。

界文化。不然，如在苏联境内抑制各弱小民族文化、语言的生长发展，徒然造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语言的优越地位，以俄罗斯文化统一其他民族文化，这样和帝国主义的同化政策又有什么分别？所以在目前这时期，应该尽力扶植各弱小民族文化、语文、艺术的发展。直到了政治的民族界限消灭以后，民族文化在相当时期内，还有培养扶植的必要。因为民族文化愈充分发展，则将来世界文化的质量，亦愈充实丰富。所以在文化的见地上亦如在政治的见地上，布尔希维克主张以民族主义应付这过渡期。（当然苏联所提倡的是以社会主义为内容，以民族为形式的文艺，请读者勿误会。）

乡苏维埃和国立医院

从U家出来，我们就在近旁附郭一带散步着。这里已是莫斯科市外，划入乡苏维埃区域。U同志引导了我去参观乡苏维埃的办公处。这乡苏维埃内部的组织设备，和我在莫斯科苏维埃所见的差不多，不过规模很小，办事人不过十余个。U同志介绍了我见那里的秘书长，是工人出身，也是红军的退伍军官。但是很和气诚恳，不象莫斯科苏维埃的办事人那样严厉。他亲自签名送给我一本俄文的纪念册。我们因时间不多，匆匆兴辞而出。又去附近看了两家医院。

在苏联，医院完全是国家设立，而且是义务性质的。

医院都附设药房。医药费分文不取。这两所乡医院，规模并不大。但收拾得很清洁。在等候诊病的人都不少。据说医生在新经济政策时代，算是一种自由职业。但现在则一律作为国家雇员，由国家发给工资。私人营医，绝对禁止。据说，在苏联现在最感缺乏的是牙医生和牙科材料用具。因为工人农民，一般患牙病的非常多。但治牙费用很大，向来是只有布尔乔方能踏上牙医生的门。革命以后，劳动者医药费都由国家担任。因此连最贫困的农民，都想去镶上几粒金牙，于是牙科医生都忙的不亦乐乎。

中 央 电 局

回到莫斯科市内，已经是傍晚灯火时分了。U同志邀我到少年先驱^①的大会里去旁听，但因为时间还早，顺道去参观中央电局。

这中央电局是莫斯科市内大建筑物之一。是高八九层的大洋房。底下是邮电总局，六层楼以上是中央电报总局。U同志说这中央电报局是最近二三年内重新扩大改造的。设备都很新式，为世界大电局之一，值得去参观一下。但电局关防严密，平常人不易进去参观。U同志向局内办事人商量了有半个钟头。拿出他的党证作保证，方才允许我们进去参观。坐了电梯上楼，又经过了数重门。每一重

^① 现通译少年先锋队，下同。

门都有O.G.P.U.的警察守卫着，要验过通行证才放行。出来时也是如此。

这是苏联全国电报通信的神经中枢。苏联和全世界各国以及苏联国内的相互交通，全是从这中央电局辗转传达。规模颇宏大。收报发报全用自动机和真孔筒。机械设置据说都是仿美国最新式的装置。每天收发及转送电报平均为二百五十万字。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间，托洛斯基当人民外交委员时，震动全世界的革命政府对全世界的通电，便是从这里拍发。

这中央电局的雇员有二千六百人，分日夜班轮流工作。每日劳动七小时，每五天休息一日。工资每月自九十六至一百二十卢布。尚有许多补助工资，如疾病保险等不算在内。工人是女工比男工更多。

少年先驱大会

因为在中央电局，消磨了过多的时间，到了少年先驱大会，会已将近完毕了。这是在一所大戏院里开会的。我们进去时，招待的人便问我们是不是正式代表，我们说不是，便引导我们在旁听席坐下了。

会场的光景很使我吃了一惊。原来这广大的戏院子，楼上楼下一千多个座位，全被天真的勇敢的少年人占的满满的。七、八岁的孩子，坐在前列，略大些的在后排。最后列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主席台上，坐着的也是十

五、六岁的少年人，只有一个是二十余岁的青年，据说是少年先驱的导师。少年先驱一律着童子军式的服装，戴着尖形制帽，红色领带，左臂上围一条红布。虽然满场都是未成年者，秩序却是很整齐。倾听演说，参加辩论，都非常认真。每一次演说的走下台时，大家一齐鼓着小手掌。每一次乐队奏乐时，都站起唱《国际歌》。

我们进去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德国少年先驱的代表，正在高据着讲台演说。声音小而尖锐有力。说话时举起他的小拳头作势。每说完一小段，接着便是雷一般的掌声。我虽不懂得所讲的话，却已感受到一种稚嫩而壮烈的气氛了。

这里是充满着另一种感情，和成人的集会不同的一种感情。这里的空气是表示着：这些少年先驱们的小小的肩膀上，能够担当起整个人类命运的重担子。未来原来是属于他们的！

据说，在苏维埃联邦，孩子们从脱离母亲的怀抱时起；比较优秀强壮的，都被施以特殊教育，养成自动自治的能力。从四岁至七岁的孩子，是被称作“十月人”^①(Oktobru-lo。这“十月人”的原义，大概是指十月革命以后出生的孩子)。从八岁到十七岁编入了“少年先驱”(Pioniro)。十七岁以上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共产主义青年团又是党的后备队。党员是从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挑选出来。共

^① 现通译“十月儿童”。

产主义青年团是从少年先驱中拣选，少年先驱是从“十月人”中择取，而“十月人”又是从劳动者的儿女中选拔的。用这重重提炼的方法，才能把无产阶级中间最精华的分子，尽数吸收到了党的队伍里去。

少年先驱的教育，并不是一种训话式的公民教育，或党义教育，乃是活的自然主义的教育。指导者用暗示和启导做方法，使儿童充分认识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动植物的关系，认识生产与劳动的基础知识，尤其是使习惯于集团的生活。总之，是以实现未来的理想社会为鹄的，训练成适宜于社会主义生活的新人。那位少年先驱的导师下台来和我谈了几句话，使我很感动。他说：“我们的理想社会不能在目前实现，只是因为我们的成年人，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都充满了布尔乔的失德与成见，在成年人中间没有一个‘完人’。但是你看啊，这一些少年人，在新社会中生长，而又是从理想的教育制度中熏陶成就的，到了这些少年人长大的时候，社会将另换一副面目。”是的，这些少年人长大的时候，世界也将另换一副面目，至少我是这样地相信。

会开完了以后，休息十五分钟，接着是音乐会。有苏联各地的民歌、跳舞和管弦乐。第四节目开始时，U同志的女伴登场，唱了一曲鞑靼民歌。唱完以后，便下台来，U同志要陪伴着她同回家去。虽然以后还有许多有趣的游艺节目，但因我一个人不识路，所以也只好跟着他们一同退出，我很满意地回到寓中，因为今天我的眼福耳福，已

不算浅了。

两教授的会见

一月三十日十一时，由V.O.K.S.的代表和R女同志陪伴着去参观共产党大学。这共产党大学是党的理论的最高研究机关。科目自然以社会科学为主体，但也有关于工程、机械等科目。学生有五、六千人。大部分是工厂劳动者，或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做数小时的工，所以许多人都在晚间上课。在共产党大学里我所见到的图书馆、教室及其他设备，和德、法大学的情形差的不多。可是大学生的模样，却全然不同。苏联的大学生，在我看来，一个个都是粗豪简朴，不修边幅。有许多学生只着了绒线衬衣去上课。既不是翩翩的少年公子，又不是戴近视眼弯腰曲背的寒酸书生。这只是因为大学生都是劳动者出身的缘故。

苏联大学生有百分之七十是劳动者的子女。在革命以前，劳动者断不能送他们的子女去进大学。现在是恰巧相反。非劳动者的子女，要进大学，是非常困难的。

R女同志介绍我见伐尔加^①(Varga)教授。伐尔加教授是匈牙利人，和R女同志是素相识。他的著作我读了已久。这样一个世界的大经济学者，骤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倒

^① 现通译瓦尔加(1897—1952)，为苏联有名的经济学家。

有些张惶失措。谁知一见面以后，却完全出于我的意想以外。原来这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只是一个矮小谦卑的人，全然没有学者和大学教授架子。如果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一定会猜想他是一个小商人。他大约有五十余岁，精神比少年人更健旺。发音尖劲洪亮，恰象他所写的文字。

我和伐尔加教授谈了约二十分钟的话；问了一些关于世界经济恐慌的问题。随后伐尔加教授又介绍我见伏丁斯基^①（Voitinsky）教授。他是共产党大学的国际政治教授，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门家。我们谈了一些关于东方问题的话。这些谈话大多是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不在这里发表。

从共产党大学出来，顺道去参观中央图书馆。馆内藏书四百五十万册，比无论哪一国最大的图书馆，都不算惭愧。可惜因物质缺乏的缘故，馆内设备，比欧、美大图书馆简陋的多。在那一间定期刊物陈列室里，我看到一千余种的外国文杂志。连英、法文的最反动的杂志，也都和各国共产党机关杂志一同放着。

巴尔干小朋友

下午，去访问一位中国朋友，知道他已离了莫斯科，

^① 现通译沃伊京斯基（1893——1953）。

怅然而返。在途中R女同志邀我顺道去访I同志的家。据她说，I同志是《文艺新闻》的主笔，苏联第一流的文艺批评家，尤其对于苏联以外的文艺界有特殊的认识与理解。他对于目前各国的无产文学运动，有甚深的兴趣。R女同志说他必乐意见我，谈谈中国文艺界的近情，同时我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新的见识。

我们欣然地去叩I同志家的门。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人，I同志的夫人，开了门，满脸笑容地迎着我们进去。

今天算是不凑巧，I同志恰巧于午前上车到外省公干去了。我竟无缘见着他。留在家中的，只有他的夫人K女同志——和两个孩子。K是R的女友，见着我非常欢喜，留我们坐下闲谈，并拿出茶和糖果，殷勤地款待着。

经R女同志的介绍后，方知道I同志夫妇都不是俄国人。他们是巴尔干半岛马其顿民族中的革命者，在欧战后的几年中，为马其顿的民族独立与社会革命而斗争，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方避难来到俄国。他们和R女同志在中欧已是共过患难的朋友。七年前，他们第一次到莫斯科，那时俄国新经济政策虽已经开始，而物质情形还是十分困难，他们因为是外国人，找食宿都不容易。R女同志指着I夫人身旁的孩子说：

“那时这孩子还未曾出世哩。又是初到，又是象现在这样的严冬，I夫人正待分娩，他们又没有钱。初来时是住在我们家里。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那时才真

是艰难的时候啊。和前天你初到那一天的情形相比，真困难的多呢。K女同志，你还记着吗，那样困苦的日子？比起那时候，现在我们真如同进了天堂呢。是不是？”

“是啊！”K女同志接着说：“现在时光容易过了。革命的最艰困的时期已成过去的恶梦了。现在我们是过着生平最美满的日子。而且是过最合理的、公平的生活。回想起从前在布尔乔国家里，不知道是怎样活的。现在我们已没有忧虑。只是I年纪大了，因为工作太多，近年颇多病。我就为了这一件事不安心着。”

K女同志是个讽刺画家，常在各国革命刊物上发表她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写新俄劳动者的生活的。美国的《New Masses》^①上面也常有她的讽刺画通信。她拿出许多画稿和从杂志报章上剪下的讽刺画指示给我看，都是具有明显的革命意识而有力量的作品。她不仅是一个女革命者，而且是一个卓特的无产艺术家。

I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就是上面R女同志说过，在他们初到莫斯科那一年出世的，现在有六岁了。还有一个略大一二岁，据说是保加利亚革命者的儿子，他的母亲早死了。父亲在苏菲亚(Sofia)^②监狱里。留着这个革命种子，由K女同志抚养着。这两个孩子看到我亲切极了。因为他们天天从家庭里、学校里、少年读物里，知道了一些热烈的

① 英语，意译为《新群众》。

② 现通译索非亚。

中国革命，但是见到中国人还是第一次。他们一个爬到我身上，捧住我的脖子，一个抱住我的膝盖，用德国话争着要我讲中国故事，向我要中国糖果、中国画片。我从衣袋角里掏出在柏林买的几粒剩余的朱古力，只说是从中国带来的，送给他们，他们就欢喜得手舞足蹈，争着要我吻他们的苹果般的小腮儿。他们向我讲了许多话，因为语言不通，虽然由R女同志翻译，也仍然是很困难，可是孩子们的天真的热情，不觉引出了我的满眶的热泪。孩子们本来就没有国家民族的界限，对远方客人，也和邻人一般；尤其是无产者的孩子，尤其是这革命者的孩子！

待我们起身要去时，这二位异国的“小同志”，各人抱住我的一只腿，无论如何不放我走，要我永远住在他们家里。后来，经K女同志再三解释，说我明天早晨还要再来，并且带了中国画片送给他们。这样我总算突破了重围。出门时那两位巴尔干的小朋友，握紧左手的小拳头，向上举起，嚷着：“Rote Front！”^①我心中起着生平少有的波动。

“苏维埃的孩子的热情，你领受过了罢？”走到街上时R女同志向我说。

我默然。因为当感情过分汹涌时，言语是被窒塞了。

① 德语，意译为“红色战线！”

R 女同志的历史

在回到福金街去的电车里，R 女同志叙述她自己的历史。她说：“我生平经过无数忧伤患难，在十年前我万想不到我还能亲见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我能过这样幸福的日子！”

原来 R 女同志是匈牙利人。在大战前，她是一个匈牙利的世界语运动者。在当时托尔斯泰一派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风靡全欧洲，她是受了这影响而学世界语的。她在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创办了当时著名的世界语刊物。她对于世界语文字的精通，在当时匈牙利是数一数二的。后来因为加入了政治社会运动，便渐渐把世界语的工作抛弃了。

一九一五年，大战进行的时期，他和他的丈夫 R 同志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中的反对战争派，即布尔希维克。当时的领袖列宁、托洛斯基还流亡在西欧。俄国革命后，中欧一带革命，达到了最高潮，结果在佩拉昆^① (Bela Kun) 指挥之下，产出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她的丈夫 R 同志便是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邮电人民委员。这中欧唯一的苏维埃政府，不到数月便遭倾覆。政府要人到处流亡。R 同志夫妇改换了姓名假扮欧战时俄国俘虏，由万国

^① 现通译为库恩·贝拉，下同。

红十字会送往俄国。但R夫妇不曾到过俄国，又不能讲俄国话，还带着三四个孩子，混在俄国俘虏队里，一不小心，便会露出马脚。这一路困难可想而知。这样的侥幸到了莫斯科。到莫斯科时虽然已出了险，但俄国话不能讲，俄国情形不明了。他们虽然是布尔希维克党员，但一切证据在路上已完全毁灭，无从证明。亏了佩拉昆和伏尔加教授认识他们，向莫斯科当局代为证明，他们一家方在莫斯科住下了。

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后来R同志因和R女同志个人感情不合，独自回到中欧仍去做革命工作。老R女同志则在莫斯科中央邮局做工，并看护小孩。

因为她是老党员，所以在邮局占重要地位，邮局职员也都爱重她。她几次想脱离邮局职务，未得许可。这次陪了我在莫斯科走了几天，她更觉得邮局工作太枯燥，想把生活变换一下。因此又向邮局提出辞职。到我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她和我谈，已得了辞职的准许。以后她想到乡间去做农村文化工作，因为她最爱和农民在一处。但因为他的大儿子还未在莫斯科学校毕业，所以一时还不能到乡村里去。她暂时想在无线电大学^①（用无线电授课的）任职员，或在一家少年日报当编辑。

在我写此文前数天，接得一个可惊消息：R同志从国外乘飞机回莫斯科，在半途飞机坠地死了。我想R女同志一定非常悲痛。我在这里附带表示我的同情与敬意。

^① 现通称广播大学。

纺织工厂

一月三十一日早晨，U同志陪伴着参观Trehgornaja纺织工厂^①。R女同志也去参观。

Trehgornaja纺织厂本是大战前一个私人所有的旧工厂（现在是国立工厂），只有一部分是新建的，而且不能算作莫斯科的最大的工厂。但因U同志本是纺织工人，他懂得纺织业的专门技术，而且又和这个工厂管理人相识，比较方便，所以介绍了我们去参观。这工厂有三千余工人。里面工作分纺纱、机织、染色、发动机等许多部分。设备和上海的大纱厂不相上下。最使我惊异的，是厂内卫生设备的完全。因为平常纱厂内——尤其是锭子间——空气往往非常窒塞。上海的纱厂工场，里面污浊的如同人间地狱，自然不必说。就是我在伦敦、不鲁舍拉^②、盎凡尔^③所见过的工场，也收拾得不甚清洁。但是在这纺织工场内，我停留了三小时，各部分都去看过，空气和在平常家宅一般清洁。虽在寒冬，门窗紧闭，因有通风洞的装置，工场内部全无化学药品的气息。地上不见尘埃。机器陈列的都有次序，而且留着很大的空隙，供人休息行走。这是平常工场内所不易见到的。据说苏联工场对于卫生设备，非常注意，

① 三山纺织工厂。

② 现通译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

③ 现通译安特卫普，比利时港口城市。

虽费了很多的钱，亦所不惜。

工人工作时间，分为两种：熟练工人，每天工作七点钟，中间包括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不熟练工人每天工作七点半钟，除去了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外，实在工作仍只有七点钟。此工厂已采用不间断工作制，机器永远开动着，工人日夜分三班轮流工作。每工作四天，分班休息一天。

在绽车间内，每一工人管四架绽车。这工作非常简单，不需要熟练的技术。我问这工场内的一个女工，赚多少工资，她说每月是七十卢布，这是全厂最低的工资率。连同一切的补助工资（即疾病保险，保产金等）计算在内，和战前的工资比较，是增加了一倍多。

厂内有育儿所，专备女工进厂工作时寄放婴孩之用，雇有保姆看护，工人进厂，把孩子寄托，工作完毕时仍带着回家。工人几乎全都在工厂内进膳。共有两个食堂：一个在工场内部，地方不甚大，单备热水、茶、面包、糖果、点心，各工人于工作中随时取用茶点；另在工场外面新建一个大食堂，则为工人进膳之所。这食堂可容四千人，收拾的甚为清洁整齐。食堂内有大讲台。食毕即可改作大会场。食品定价很便宜。平常一餐，一汤、一肉、一点心，连茶和面包，只费三十五个戈贝。比在无产者旅行社的食品价目，又便宜多了。

工厂附设艺徒学校，学生是未满二十岁的青年工人，每天除在工场作五、六点钟的工以外，便学习工作技术两点钟，和普通工人一样领取工资。

在染色工场和一个工人谈话，知道他是在莫斯科大学念书的。他对于工作已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所以管着重要的工事。他和我说对于这样的生活，非常满意。他每天做七点钟的工，在大学上三、四点钟的课，又因他担任着许多社会的文化的工作，每天为了开会、演说、辩论，又费去三、四点钟。这样除了睡觉以外，简直没有一分钟的休息。可是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觉疲劳。在苏联党的许多青年分子，生活大概都是如此。

我问他们工厂内管理权操在谁的手中。他们说关于技术部分的事，有工程师技师计划管理。工厂主任则由政府委任，但工人代表所组成的工厂委员会，有建议及监察权。主任须受工厂委员会的监督。关于雇用或辞退工人，及工资等由工厂委员会决定。工厂主任不称职时，工厂委员会随时可请政府撤换。所以实际上工厂管理权，除技术的部分外，全在工人代表之手。主任亦几乎无例外地是工人出身，而在党内有地位的。因有工厂委员会的严密监督，所以管理人营私舞弊，或官僚化的事，不易发生。据说，革命初年，因从工人出身的工厂主任，往往欠缺技术知识，以致把工厂事务弄的很糟。后来把这些不胜任的管理人，送到大学工科补习数年，此种困难，方才逐渐减少。各工厂主任，因为大部分是党员，所以比普通工人更为劳苦，往往整日夜不停地工作。有许多主任同时还在大学学校里上课。

在工场外面一块空地的角上，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

着俄文字，据说意思是“黑角”。这“黑角”是为了惩罚怠惰的工人用的，在这指定的一片土地上，插着十余个木制的平面雕像：有的抱着一个大酒瓶；有的昏沉沉地睡着；有的象一个小偷的模样；有的张着大口，吹法螺；种种丑态，不一而足。每个雕像上都写着人名和所犯的事由。据说，凡工人，有舞弊及偷盗情事，或工作怠惰，不能实践自己约定的工作标准的，经工人代表所组织的法庭判决，方在“黑角”内陈列示辱。其情节较重的，工人法庭可加以罚金或开除的处分。但一切惩罚，都由工人团体解决，工厂管理人不加干涉。

在工场内部墙上，钉着许多破坏的机件，零碎切断的纱线和布匹，旁边都写着几行俄文。我当初不知道是什么，问了他们，方知道是一部分工人因作工时不当心，毁坏了机件或纱线、布匹，于是把这被毁坏的东西，钉在墙上，旁边写着毁坏者的姓名，损失的数目，当作一种警告。这些都是维持工作纪律的方法。苏联的工人把工作纪律看的很重。违犯纪律的，必由工人共同加以惩罚。因为在苏联工人是为大众而生产，不是为少数人赢利而生产。若不守工作纪律而使生产受损失，即是对于大众的伤害，是非惩罚不可的。

另有一种惩罚方法，更有趣味。自从采行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政府颁行一种新式“勋章”，名叫“奥勃洛马夫章”。奥勃洛马夫^①(Obломov)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讽刺作家冈

^① 现通译奥勃洛摩夫。

却洛甫^①(Gontcharov) 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描写一个缺乏意志而游惰不做事的青年，是对于当时俄国的颓废青年的一种讽刺。这小说在俄国流行的很广。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劳动者当初加入了竞赛；自己约定生产的某种标准，而到了限期却不能履行时，便送给他这样一个勋章，罚他必须把这“奥勃洛马夫章”时常佩在胸口。这样的惩罚，简直成为一种有趣的恶谑了。

在工厂门口，看到了苏维埃选举的候选人名榜。原来这几天正待举行莫斯科市苏维埃选举。在选举以前，照例把各工厂各候选人名单揭贴在工厂门口。在未选举以前，工人如对于名单上所开列的候选人，有认为不满意的，可提出检举，取消其候选人资格。这Trehgornaja 工厂的候选人有十余个。U同志说，这些候选人几乎全是纺织工人。其中有一个是从前这工厂里的工人，因干革命工作，在芬兰被捕，监禁已数年。现在把他列作候选人之一，乃是表示工人们对于这位革命同志的敬意。

谷麦托辣斯

午后参观Zernotrúst即谷麦托辣斯。这里是国营农场的总管理机关，规模很大，聘用许多美国专家和顾问，计划农业集团化^②的经营及发展。我见了这里的主任，问他国

① 瓦通译区察洛夫，《奥勃洛摩夫》是他的名著。

② 瓦通称农业集体化。下同。

营农场的情形，因此知道了苏联农业经济政策的梗概。我对于苏联农业改造计划，甚感兴味，到莫斯科时，就想往农村去看一下。但因为天气太冷，我不曾带得御寒的皮衣服，在城内已经忍受不住，到乡间会冻出病来。而且据他们说，这时候田庄全被雪掩盖着，一切田野工作完全停顿，即使到了农村里，也看不见什么东西，所以终于没有去，单在谷麦托辣斯里，询问了一些关于农业集团化的实施情形。

说到农业集团化，国内似乎还少有人注意。依我个人看来，这是布尔希维克革命的最大胆的工作，这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最猛烈的进攻。十月革命是震动全世界的一件大事，但在我看来，一九二九——三〇年苏联的农业集团化运动，意义和十月革命一样重大，因为这是摧毁了苏联国内资本主义的最后壁垒。富农的逐渐消灭，是表示社会主义战线的最大胜利。虽然农业集团化现在还未做到完全成功，但这样的大胆尝试，已经是值得我们的深切的注意了。

原来土地问题，农改政策，为苏联革命的最大难关。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间，为了这问题，曾引起严重的意见冲突。依目前的情势，是斯大林的政策得了胜利。我们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收归国有，重行分给农民耕种。但因为农民都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根性，他们分得耕地后，仍把所耕的土地，看作自己的私产，不愿把耕种所得的食粮，除自己食用以外，提供给政府。政府不得已，

向农民强制征发粮食，农民仍顽强抵抗。结果，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农业生产，骤然低落。都市劳动者，粮食供给，异常缺乏，全国陷于大饥荒。因此到一九二一年，政府采行新经济政策，暂时对农民让步，许农民买卖土地，雇佣农工。这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到了一九二八年，苏联的农业生产逐渐回复到大战前的水平。不但都市粮食供给，不再起恐慌，而且可以用剩余的谷麦，输出到国外。

但这到底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因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政府对农民加以放任，于是在农村，富农阶级如春草怒长。向来自有家宅、牲畜、农具的大农中农，兼并小农的土地，雇佣贫农耕种，成为变相的地主。这富农阶级的产生，使社会主义的实现，遇到极大的障害。不但如此，俄国耕地向来是小农制，耕种技术甚为幼稚。为增加农业生产起见，非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不可，而机械化、电气化必须先把土地集中，开成广大的农场。在土地依然私有的形势下，大农场的建设，实为不可能。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五年计划开始实行的时期，政府采断然的处置，实行农业集团化计划，以根本解决农业问题。所谓集团化就是把私人经营的土地收回，改由Sovkhoz（苏维埃农场或称国营农场）及Kolkhoz（合作农场）^①经营。在苏维埃农场及合作农场内，房屋、牲畜、农具、耕种汽车都归公有。收获的农产物，亦归公有。农民归农场雇佣，发给工资，与都市工人同一

^① 现通译集体农庄。下同。

待遇。这些国营农场和合作农场，有一个别号叫“谷麦工厂”。因为这些农场，完全采集中分工组织。耕种面积可以大到一千余公顷，每一农场往往备着数千架的耕田汽车。一切耕种收获全用机械，由专家及工程师集中指挥。其性质与都市内的工厂完全无异。这样便把农业的特质完全消灭，农业劳动者，依着规定工作时间，在田野工作，按时领取工资，亦与都市劳动者完全相同。这农业工业化的计划，把农村与都市的差别性取消，把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克服，使资本主义失却最后的立脚点，不用说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中的一个最大胆的尝试。至于因农业集团化的结果，得以扩大耕地面积，尽量利用科学技术，以增加生产率，这更是非常明显的。

自然这大胆的尝试，断不是一无困难的。自一九二九年以来，苏联的农民集团化，以高速度进行，中间因富农及农村反动分子的顽强抵抗，受了极大的牺牲。一般富农往往屠杀牲畜，焚烧房屋，暗杀党员，以阻碍集团化的进行，这中间经过许多次恶斗，和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的严重。但就最近所报告的结果，政府的政策，终于得到了胜利。在一九三〇年五年计划第二年度終了，全国耕地集团化的已占百分之二一·五。在产麦区域，集团化的耕地占百分之四三·八，在北高加索则占百分之六十。这数目已超过五年计划所预定最后一年的数目。全国农民的百分之二一·五，即五百余万人加入合作农场。全国所有耕种汽车，达七万三千架，共有一百零二万

二千六百零二马力。列宁说过的，俄国有了十万架的耕种汽车，社会主义可以完全实现。现在和这数目已经差不多了。

这农业集团化的成功，据说，不单是靠了农村的党员的努力工作，有一部分还是靠了都市劳动者的协助。民众全体把农业改造看作一件大事。许多党内重要人物和党外知识分子都到农村里帮助农民经营合作农场并劝诱农民加入。春天播种，秋天收割的时候，都市的电气机械工人都到苏维埃农场、合作农场，去帮同工作，开驶和修理耕种汽车。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全体动员，到农场去作农事演讲。新闻记者去到农村编印临时刊物。会计员去帮助农民整理帐目。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驱都到农村下文化宣传工作。甚至莫斯科大戏院的第一等名角也都离开都市，到乡村中轮流演剧，慰劳那些在田野工作的农业劳动者。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是在农村收割以后，播种以前，不曾亲见到那种举国若狂的气概，但单就他们的口述，已可见苏联对农业集团化的重视。因为在他们看来，目前世界无论何国，农村衰落，农民经济困难，农村与都市失调，成为不可挽回的危局，惟有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化，为全世界农民开辟一条新路，为农民经济的唯一转机，所以他们不惜以全力干去。

克列姆林^①

莫斯科这个城市，第一次见于历史纪载，还不过是八百年前的事。但到了十四世纪初年，莫斯科已成为东西行旅的要道，部族征战的重镇。东方蒙古的游猎部落，西方大俄罗斯、立陶宛的封建贵族，都在这大平原上杀来杀去。一三〇〇年，俄罗斯人的祖先，在莫斯科伐河^② (Moskva) 左岸小山上用泥土木料，建造了一个堡垒，预备给各地避兵祸的难民，在这里躲掩。这堡垒后来就叫克列姆林 (Kreml 或 Kremlin)。“克列姆林”在俄文便是城砦堡垒的意思。后来莫斯科城市逐渐扩大，克列姆林也经数次改建，成为城市守卫的中心。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大帝占领莫斯科，曾在克列姆林设起宝座，可是不到几天，便被俄罗斯农民赶跑。想不到这八百年来酋长、贵族、帝王、教会争战掠夺的城砦，却成了普罗列太里亚的统治中心，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历史便是这样地开着玩笑的呵！

现在的克列姆林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邦政府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所在地，所以警卫非常森严，平常人是不容易有机会进去。我因了V.O.K.S.的介绍，方得进去看看旧俄皇教堂博物馆。同去的还有一对

① 现通译克里姆林宫，下同。

② 现通译莫斯科河。

美国人夫妇。我们在大门口等候的很久。看着那些进里面去的，都是长着满脸大胡子，着着褴褛不堪的旧皮外套，腿上染满泥土的大汉，据说都是从高加索、克里米亚、滨海省等远处来的农民代表或工人代表。在别的国家里，这些人连进县知事衙门里去都要被撵走的，现在却可以在全苏维埃联邦的中央政府里自由出入。反之我在伦敦的唐宁街（首相府所在地），巴黎的Palais Royal^①（国务院所在地）一带看见坐着汽车进出，穿戴着燕尾服大礼帽的“绅士先生”们，却没有权利进克列姆林了。

克列姆林是一个五角形的城砦，面积大约有一百英亩，高据莫斯科城市的中心。周围建筑着砖石砌成的高城墙，绕城约有中国四五里路。共有五座城门（但平时只有一门开着），每座城门上面都有一座城楼，高可望见莫斯科全市。五座城楼全是著名的古建筑。克列姆林里面最著名的是几所大教堂。其中最古的是东方式建筑的乌斯宾斯奇大教堂（Uspenskiy Cathedral），为前俄皇、俄国总主教、莫斯科主教登位之地。又勃拉哥维斯千克大教堂（Blagovyeschensk Cathedral）则为俄皇作礼拜并行大婚典礼的教堂，藏有名画甚多。希腊正教向为俄国国教，其历代宝器及总主教墓，都在这城墙之内。所以克列姆林向为俄国圣地，革命以前，进克列姆林城门，须一律脱帽，和紫禁城下马，一样的情形。现在已把一部分的宫殿教堂改为博物

^① 法语，意译为皇宫。

馆。我去参观时，有两个教堂内部，正在搭着高架，从事修理。据说为了留作后代的参考纪念，政府对于这些宗教遗迹，不但不去毁坏，而且还费了许多钱，去修理保存。

在西欧的时候，常听到教会的宣传，说苏联对于宗教尽力摧残。许多教堂都被拆毁，教士被枪杀，去年罗马教皇还居然为了此事提出抗议，檄告全世界，大有欲重兴神圣战争之意。据我在莫斯科所见，许多教堂还开着。不过到教堂去作礼拜的，只有那些老妇人，青年人是没有一个进教堂去了。有的教堂因为再没有人去作祷告，经附近的工会决定，改设工人俱乐部或学校，这是事实。但说把一切教堂都拆毁，以目前苏联之居屋缺乏，布尔希维克党决不如此傻气。至于教会财产归为国有，教士不能不劳动而得食，这也是事实。但宗教信仰依然许人民自由，政府并不干涉。不过革命后的青年受新式学校教育和文化宣传的影响，都已变了无神论者。“神圣俄罗斯”的招牌是已不能再挂上了。

列 宁 墓

从克列姆林出来，便去看列宁墓。列宁墓背靠着克列姆林城墙，前面就是每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举行劳动者大示威的有名历史纪念地红场。

在我的想象中，以为列宁墓应该是一座巍峨的建筑物。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应该埋葬在象麦加的回教堂那

样巨大的殿堂里，至少也应有象巴黎Invalides^①内拿破仑墓那样的规模，方才可供全世界平民大众的凭吊。但我走到红场前面时，便大大地失望。原来这列宁墓不过是一座低矮的构成派的建筑物。外表颇和巴黎国葬院（Pantheon）相类似，但只有四分之一的高大，雕饰和一切苏联新建筑物相同，是非常单纯。和墓后的克列姆林城墙，左旁的高大而华丽的城楼相比较，更显出这建筑物的谦卑。不过整个的气概，却是雄壮而朴素。墓的前门宽不过二三尺。来参观的人在门前排着单人的队伍，鱼贯而入。进了门便向左转弯，踏着磁砖砌成的石阶，走下墓道，正中便是棺木，棺木下层是铜制的，上层是一个玻璃罩。列宁的遗体露出半身。颈部和右臂靠在枕上和被上。玻璃罩内面有反光镜的装置，所以状貌看的很清楚。观众绕着足前经过，全屋静寂无声。随后从右旁偏门走出门外。据说，每天列宁墓开放的时间，参观的人是和流水般来往不绝的。

墓门上面砌着列宁的名字。墓内却没有半个字。连一切图画雕刻的装饰全没有。

我是在巴黎所演的电影里第一次看见过列宁。他从办公处缓步出外，头戴着工人小帽，右手夹着一个皮夹，一边和一个老年的教授谈话。使我吃惊的是他那种谦卑的模样。身躯和腿比常人短小。但广阔的肩头，高耸的额部，英锐的目光，显出他是一个非常的人。这次看到他的遗体，

^① 法语，意译为残废军人院。

使我也同样的印象，只是两眼半闭着，已经不能反射出锐利沉着的光芒了。

列宁墓两旁，数十丈长的石阶，据说下面是埋葬着数百革命的献身者的遗体。但现在是被一尺余厚的白雪掩盖着，看不出一些踪迹。

在苏维埃国家，英雄主义与个人崇拜是不存在了。但阶级斗争的战士，仍然有着他们的“不朽”！

苏维埃选举会

午后六时，到福金街六号的联络工人俱乐部，因为莫斯科世界语同志在这里召集会议，特意邀我去出席。这俱乐部是一所三层楼的很精致的建筑，屋内装饰非常华丽。在革命以前是一个著名大茶商的第宅。这茶商是以输入中国茶致富的。据说，李鸿章聘俄时，应茶商之请，也曾到过这屋子。革命后由政府没收改作联络工人（即邮政，电报、电话、无线电职工）俱乐部。内部设备很完全。有图书馆、音乐室、体育室、补习学校等。更有儿童游戏室，备着小桌小凳，一切玩具，职工们来俱乐部的时候，便把小孩在这里暂时寄托。

因去的时候还早，俱乐部的大会议厅里，正在举行家庭苏维埃妇女代表选举。世界语同志们便介绍了我和另一位意大利世界语者同到选举的会场里去旁听。

在苏联，选举不但是产出劳动者代表的一种过程，而

且是训练民众的一种方法；所以不用议会政治国家所习用的个别的秘密投票制，而用集团的公开选举制。如前节所述在选举期前，各处推出候选人，将名单张贴公共处所。到了选举的时期，五百人以上的工厂或机关里，劳动者各在其工厂或机关内开选举会。人数未滿五百的工作机关，则就附近地段合并二个或数个工作机关，开选举会。其余自由职业者则集合各个同业者开选举会。连日莫斯科举行市苏维埃选举，我在街上看到许多选举人的队伍，前面用乐队引导，整队行走，拿着标帜，喊着口号。据说这些都是未滿五百人的工作机关职员或自由职业者，排队前去参加选举会的。

我在联络工人俱乐部所看到的，是家庭妇女的选举会。在苏联只有体力劳动者与精神劳动者有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权。但劳动者的妻，因为抚育儿女，家庭工作过繁不能到工厂工作的，也同样享有选举权。

走进了会场里面，第一使我惊奇的，是那选举会场的布置。这会场是前茶商第宅中的一个跳舞厅。在一端建造了一个大主席台。主席台上和两旁悬挂着数尺方的大字，和两个用木板雕成的巨人，用电光配合，恰如新派的戏台布景。满场都是彩色的电灯。两旁楼厢上排列着音乐队。这是何等壮丽辉煌的排场。主席台下面一排排整齐地坐着的却尽是从三十岁到五六十岁的中老年“管家婆”。她们一个个都瞪着眼，向着主席台上静听。这些家庭妇女因年龄、环境的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比较地不大习惯，

但就外表看来，似乎她们对于每一段演说，每一个决议，都非常留神，而且很感兴味。

选举会开始时，照例是各种报告，接着是候选人演说，宣布各人的主张。会场中有几个人起立向候选人诘问，候选人都加以答辩。演说完毕后，举行选举。选举是用举手法，每提一个候选人时，赞成的一律举手。最后以举手最多的当选。每次一个代表选出时，乐队便奏《国际歌》，全场欢呼。

当主席发见我们在旁听时，便要求我上去说几句话。这些列席的家庭妇女，见一个黄脸孔的人走上台来，都大声高呼。我接着说了贺辞。场中有个比较年轻的女子起立问我，说上海纱厂女工每天做十二点钟工作，在中国农村里妇女被翁、姑、丈夫随时殴打欺侮是不是事实。这一问使我十二分难受。

实在的，每天十二点钟的劳动，在苏维埃的妇女，已经是不能想象了。现在她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的平等地位，已有了确切的保障，所以虽然在不久以前，她们也受过类似的屈辱，却已不再记忆了。

世界语者的招待会

世界语同志的招待会开始，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和我同时被邀请的，更有一个意大利的金属工人，他因受了白色迫害，到美国避难，后来又从美洲来苏维埃国土，到莫

斯科已有一个多月，略能讲世界语。我问他在这里的感想如何，他说是以前意想不到的满意。他打算在苏维埃住下，进金属工厂作工。

我向莫斯科世界语同志表示了恳切的谢意，接着报告了去年在伦敦出席 S.A.T.^① 大会的情形。列席的莫斯科世界语者，似乎都非常关心国际工人世界语运动，虽然关于俄国以外的世界语运动，他们都不易得到正确的消息。末后，D同志代表苏联世界语同盟莫斯科分会向我致辞，大旨是说目前苏联与中国国交虽尚未恢复^②，但这两大民族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不久必能重新携手。这两大民族共有六万万的人口，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陆地，一旦联合起来，世界平和方有保障。而使这两个民族联合国际公用语Esperanto实是唯一必需的桥梁。

直到午后，联络工人俱乐部的集会，方才尽欢而散。

阿摩汽车工厂

二月二日上午到职业工会总部访J同志，因为昨晚在联络工人俱乐部和他约定同去参观阿摩(Amo)^③汽车工厂。职业工会总部是莫斯科著名大建筑之一，系由俄皇时

① S.A.T.是国际世界语组织全世界无民族协会(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的缩写。

② 中苏在1932年方在日内瓦恢复邦交。

③ “阿摩”是俄语“莫斯科汽车制造公司”的简称。

代贵胄学校改建的。工会内部规模很大，有会议所、俱乐部、大食堂、各部办公室，可惜时间太短，不能逐一去参观。工会总部房屋的一部分是无线电台办公处，J同志便在里面办事。有许多美国英国人，被雇用在此处服务。他们都很热诚地用英语和我谈话。J同志是世界语运动初期的传播者之一。据他自己说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世界语是由他教授的。近来他很热心于无线电事业。自信无线电播音，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文化的唯一利器，所以在工人中间，主张竭力宣导，使每个工人都具有关于无线电的常识，了解收音机装置修理的技术。

在职业工会总部午膳后，便坐着电车向近郊出发。同去的除J同志以外，有U同志，昨晚在世界语集会中遇见的意大利人，以及同住在无产者旅行社曾到过美国的那机器工人。

坐了约一点钟的电车，我们方到了阿摩汽车工厂。这完全是一所新建的工厂，一切机械设备，都是近代式的。在革命以前，俄国不能自造汽车。以前在莫斯科近郊只有一所汽车修理工厂，由私人经营，工人不过百余。革命以后，因全国交通事业发展，汽车需要量激增，同时因农业机械化、集团化之故，需要大量的耕田汽车。虽然每年从美国输入大批的摩托车，仍不够用。五年计划中，规定建造大规模的汽车工厂数所，阿摩工厂便是其中的一个。这工厂最初是就原有汽车修理工厂改建。但现在扩充的很大。全厂有二十余所的大工场，全是新建的，旧厂只是其中一

小部分，改作材料堆积间。雇用工人去年还只四千人，现在已增至一万人，到今年年底因有数部分新厂落成，将增至一万五千人。

这么一个大工厂，单是巡视一周，也决不是半天内所能完事。所以厂中的引导员问我愿意参观那一部分。我说，对于机械工程，我是门外汉，实在无参观必要，我所希望参观的，是一切关于工人生活的设备。于是他们立刻引导着，去参观食堂、厨房、浴室、游泳池、补助学校、托儿所、赤色救济会、洗衣房等处。也只匆匆地看了一下，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我们方才回到莫斯科市内。

工 厂 生 活

社会主义的最后理想，是要使劳动的场所，成为人类活动的本位。人类自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以后，便以家庭为生活本位。在农业社会中，家庭不但为食宿之所，而且为劳动、娱乐、教育之所。人在家庭的小天下中，生长老死，和社会生活不相接触，因而养成自私、贪鄙、人与人互相掠夺的习性。到了产业革命以后，家庭工业崩坏，都市大规模工厂出现。工厂遂成为出卖劳力的场所。除劳动以外，全部生活仍在家庭以内。因劳动者经济的困苦，家庭生活不能给予一种慰安，而专以剥取剩余劳动为目的的工场，在劳动者又视为人间地狱，无情趣可言，这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惨剧。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虽还

未免过早，但却是向着这方向走去，其最显著的事实，即劳动者逐渐脱离家庭生活而以工厂为生活的大本营。从前工厂只是劳动的场所，而现在逐渐成为饮食、休息、娱乐、教育、养育儿女乃至一切人类活动的场所。至于家庭则已缩小到成为单供睡眠的地方。除了睡眠以外的时间，几乎全部消耗在工厂里面。在工厂里，除七小时的工作以后，一切娱乐、教育、饮食，全体工人都营着共同的生活。这样人类生活方才趋向于集团化、社会化。从前关闭在各个家庭的小天下之内所造成的自私、贪鄙、占有、妒忌的习性可以逐渐消失。这是到社会主义的唯一捷径。

我不敢相信苏联一切工厂内部工人生活的设施，都非常完备，时间上、经济上的困难是应该原谅的。但至少象阿摩厂那样的几个模范新工厂，却已颇接近理想的境地了。阿摩厂有一万个工人。对于这一万个工人，阿摩工厂就代替了他们的家庭。他们每天清早进厂，除在工场内做七小时的工作以外，就在厂内的食堂进餐，在厂内的俱乐部、会议厅，娱乐集会，在厂内的补习学校、图书馆补习，乃至洗衣、游泳、运动、阅报、交际、疗病、育儿，全在工厂内部。他们的孩子于每日清晨带到厂内的托儿所，直到晚间方一同回去睡觉。不用说，这样的集团生活对劳动者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先去参观了食堂。这食堂比我在莫斯科所见过的都广大。大约有二千多人的座位。四个或六个人坐一个桌子。每张桌上都放着一个花瓶，插着几朵纸花（因为在

这时候，得不到鲜花)。布置的井井有条。要不是四壁都张贴着赤色的标语和宣传图画，简直和平常布尔乔大饭馆内的陈式没有什么两样。食堂的一端是长柜，来这里进餐的都在柜上先买饭票。每全餐一汤、一肉、一点心、连面包、茶，收费三十戈贝。菜是由食堂的办事员（大多是十余岁的孩子）端送到桌上。食堂的另一端，有着一座大讲台，是开会时用的。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午餐已经完毕，正在举行苏维埃选举候选者的演说，有一部分工人在听着。

食堂的旁边便是厨房，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大规模的厨房。据说这厨房每两小时内可供给六千份的全餐。一切设备全是用新式的电气装置。汤是用蒸气大锅烧的，糕饼是汽炉蒸的。甚至马铃薯也是用机器来去皮，据说这去皮的机器，还是新近一个厨房工人发明的。厨房的工作，完全用分工制，例如专管马铃薯去皮的就有女工十余人。另有一个极大的冷气间，藏着宰死的牛三十余头，猪羊各十余头，据说可在这里贮藏二三个月，肉味不会变坏。

厂内有工人补习学校，是连接三、四十间的教室，布置和平常学校一样完备。每一教室内有四、五十人至百余人的座位。所授科目据说是非常繁多，工程技术、无线电、外国语（特别是德语、英语）、社会科学、会计学，一切都有。依工人的志愿，随时添设或裁并。有许多教室，整日夜不停地开班授课。日班工人多在夜班补习，夜班工人则在日班补习。

工人浴室的布置和上海青年会内的浴室，没有多大差别，盆汤与水淋浴都有，不过地方却大得多。工人只须付数个戈比，便可洗浴一次。离浴室不远，是一个室内大游泳池。池水是用温水，可容数百人。这样大的室内游泳池，在上海没有见过。据说另有工人体育场，因时间不够，不曾去参观。

托 儿 所

我们都知道在苏联有公共育儿院，劳动者可以把儿女送去留养，收极低廉的费用，甚至完全免费。但大部分的母亲却不愿意和她们的最亲爱的孩子们分离，一方面则自己又须到工厂做工。为了这些母亲的方便，所以工厂内有托儿所的设置。这些托儿所的设备，和公共育儿院差不多，不过孩子们不在里面过宿。每天母亲进工厂的时候，便把儿女带到托儿所里（但八岁以上的送进学校去），直到晚间出工厂时，方把儿女领回。所以在苏联，劳动者的孩子们不再在家庭中长大，实际上是在托儿所内养育的。从脱离母胎起，他们便和他们的同等年龄的小朋友们，一块儿生活，一块儿游戏，一块儿受教育。这样，人从在襁褓里的时候起，已习惯于社会生活了。

阿摩汽车工厂有两个托儿所。一个是婴孩保育室，专收未满四岁的婴孩。另一个是幼稚园，收着四岁到八岁的孩子。我们先去看了婴孩保育室。进门处是一间婴孩存放

室，备着一张特制的大圆桌，周围有着遮栏。婴孩送来时暂时放在桌上。婴孩又依年龄的不同而分列在各个特别的房间。里面放着许多小摇床。另外有游戏室、哺乳室等。室内放着小桌、小椅、小床、小磁盆等，都是为着婴孩们特制的。内部非常整洁，净无纤尘，室内参观，须脱了鞋方能进去。婴孩们由许多女医生和保姆料理看管。我们会见了那位管理主任，是一位女医生。她和我们谈了许多内部情形和办事上的困难。她说：“我们为了克服一般母亲们的无知，费去很大的心力。劳动妇女们不幸大多是缺乏智识者。她们还保持从前的旧习惯，无论如何，总不放心把自己亲生儿女寄托在别人手中。她们又往往缺乏科学常识，对于托儿所用科学方法养育儿童，总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们有时为了极细小的事情，都用很大的努力，对母亲们解释宣传，方能逐渐博得她们的信仰。”可见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单是婴孩公育，都有着许多的困难。

幼稚园的设备也和保育室差不多。不过在那里，孩子们的年龄大些了，在练习着各种手工、图画、学习文字、数学等。但都是儿童自动地工作，保姆只在旁指导着。在那间工作室壁上写着列宁的一句话：“爱你的朋友们！”还悬挂着壁报，登的尽是儿童作品，有许多儿童所作的绘画，特别天真有趣。

托儿所的主任要我在他们的来宾参观簿上写几行文字，以作纪念。我提起笔欣然地写着：

“我庆贺着这些在自由平和的空气中生长而不知人世忧患的苏联的劳动者的孩子们。会见了这些天真可爱的小朋友们，我对于人类的后代的幸福，才有了确信了。”

当我们走出门时，J同志说，孩子们在欢送我们呢。我回过头一看，果然，大门旁玻璃窗内，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向着我们举手欢呼！

参观了托儿所以后，去看了厂内的赤色救济会办事处。最后又去会见厂内《工人日报》的总编辑。这日报每天出一单张，销售九千份，是专供给阿摩厂工人阅看的。我们和那位总编辑交换了一些谈话，那位总编辑问了我许多关于西欧及中国工人生活的情形，他说要把这段谈话在第二天日报上发表。

大戏院的跳舞剧

虽然对于戏剧，我是门外汉，但新俄罗斯的电影与演剧艺术，常使我感到特别深长的趣味。苏维埃电影艺术，现在已震惊了全世界了。可惜俄国电影的代表作品，因受神经过敏的各国当局的取缔，我没有机会见到，但就我在巴黎所看到过的《一张沙发和一只床》、《亚细亚的风潮》、《土西铁路》，在柏林所看过的《大地》，虽都是些不重要的作品，却都充分表现出真实的情绪与特创的风格，和充满

着卑陋趣味的好莱坞^①作品相比，真要算是电影艺术中的一大革命了。至于苏联的演剧，我在巴黎见过的莫斯科艺术舞台演剧团所演伐丹戈甫（Vakhtangov）的《都兰多公主》（《Princess Turandot》），梅友荷尔德（Mayerhold）剧团所演《巡查官》（即由Gogol的名剧《Revizor》^②改作的），莫斯科犹太剧团所演《二十万》。（《二十万》和《都兰多公主》两剧我在《东方杂志》二十五卷十五号里曾经介绍过。）这几次的观剧都使我感到十二分的兴奋和悦意。可惜在西欧，看俄国戏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这次侥幸得在莫斯科住几天，很想再有机会去看几次新俄的演剧。

但是不幸的很，一个外国旅客，要在莫斯科观剧，并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因为莫斯科的戏院全是国立，或者是由国家补助的。演剧的目的，并不是为赢利，而是为宣传与教育。所以观众几乎全体是劳动者。戏票是在各工厂和职业工会里分派的。据说工人看戏的机会很多，而购买戏票也很便宜。至于外国旅客只有在几个大戏院里，方买得到戏票，而且须出很贵的票价。我到莫斯科的第三天，曾托V.O.K.S代买戏票，第二天，V.O.K.S.回复我，说是因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开会，一星期内全莫斯科戏院出售的座位全被大会代表包去了。如要买到戏票，至早须在十天以后。我不能在莫斯科留的这么久，因此对于观剧几乎绝望了。

① 好莱坞是美国洛杉矶的电影城。

② 现通译为《钦差大臣》，果戈理名著。

但到了第五天U同志来报告我，说莫斯科大戏院还有二三个空座，但售价非常贵，每人要十二卢布，合中国钱就要二十四元。我虽旅囊不充裕，也颇想去一试，因这机会是不多得的。但U同志却再三阻止，说犯不着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买票。他可以设法免票去观剧。他为这事，整整去奔走了两天。因为他有红军军官与普罗作家这两重资格，到处可以通融。可是去戏院交涉几次，仍被拒绝。后来他跑到人民委员会的秘书长那里去要了信来，方才弄到三张免票。当他告诉我们成功的消息时，我们都不胜狂喜。因为他所要求的免票，是莫斯科大戏院的座位。那时正演着轰动一时的跳舞剧《红花》。而且这剧的情节，又是取材于中国的。

莫斯科戏院都是在晚上七点左右开演，到九点余便散了。在七点以前我们到戏院广场里，前面便是莫斯科大戏院，这是莫斯科最大的剧场，可比之于巴黎的歌剧场（Opera）。建筑很大，除楼下大厅以外，中央及两旁的厢楼共有七层，全场大约有三千个座位，是完全挤满的。我们虽然不花一个钱，却坐了全场最优的座位。原来是厢楼正中的一间，在革命前是俄皇和皇后的御座，这御楼正对舞台，而且直通屋顶，只有一层。在从前，这一间里放着两个宝座，在皇帝和皇后不来观剧的时候，便闭锁着，平常的观客不能进去。现在是把宝座除去，按放了十余个座位。无论怎样卑微的劳动者也可以进这御楼观剧了。我们也侥幸占了这御楼的座位。这御楼中，地毯、门帘都非常

讲究。在厢楼后面是休息室，有着列代名伶名文学家的雕像和许多古画。坐椅全是用很厚的绒垫，楼梯和走道全用大理石铺成。这样华贵的地方，现在只有劳动者有权利享用了。

据说平常在大戏院演的都是歌舞剧。我们去的那天是演着 Ballet^①，Ballet 是一种只有音乐动作而无唱白的跳舞剧。俄国的跳舞剧本来是世界有名的，现在更导入革命后新派艺术的成果，结构、跳舞、布景、音乐，就无论那一方面而论，都有了彻底的改革。

《红花》还是初次上演的剧本，据说已有很大的成功，苏联的文艺界颇加以重视。这跳舞剧完全取材于中国，用中国背景、中国音乐，表现现代中国生活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全剧不过四幕：第一幕的布景是上海黄浦滩上的一个轮船码头。一支苏联商船正停泊着，苦力们在起卸货物。码头上有许多外国水兵（也许是英、美水兵），一面拿着鞭笞打苦力，一面戏弄着码头旁经过的妇女。后来来了一乘花轿，抬着一个漂亮的新娘子。水兵把花轿拦住，抢去新娘子，叫她在码头旁的“酒排间”内陪着水兵跳舞。这新娘也居然从命，殷勤向水兵侑酒。码头上许多黄脸苦力看的不平，立时暴动起来，把码头上水兵一个个打倒，再进酒排间，去打那不要脸的新娘。于是酒排间内大批外国水兵出来，和叛乱的苦力，互相厮打。正在危急中，船上

① 现译芭蕾舞。

戴着红星帽章的水兵数十人，赶到岸上，帮助中国苦力，把英美水兵一起赶跑。第二幕是新娘的父亲——一个就地绅士的客厅，这狡猾的绅士（大概是买办一类的人）把苏联船主迎到家里，谢他们营救之恩。第三幕是绅士家后花园的夜宴。原来绅士串通英、美水手，想用药酒毒死苏联船主及水手。幸绅士宅中的佣工暗中通知客人，客人拒绝饮酒。主人见事败，乃做一手势，园中树枝上埋伏的英、美水兵巡捕一齐出来，把苏联水手团团围住。同时宅内佣工及苦力则加入水手方面，和“帝国主义”战斗。第四幕极短。工人得了最后胜利，开幕时全场黑暗，渐渐放出一线红光，东方天空上一颗红星出现。场中隐约看见一面红旗。渐渐光明，最后在满场红光中，幕徐徐落下。

就剧情而论，仿佛只是浅薄平凡的宣传剧而已。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剧中处处用象征的暗示的方法表现出生命活动的力量。从开演到闭幕，全用跳舞和布景来表现，在平常教训剧、主义剧中所用的写实的方法，全然找不出来。反之观了《红花》，正如看梅德林克、罗斯坦一派的象征剧，把人引入幻想的世界里。不过在这里象征的用法，却更有气魄，更有活力，决不是带着颓废气氛的新浪漫派戏剧可比。

新俄的演剧艺术里，布景占极重要的位置。象我所见过的伐丹戈甫与梅友荷尔德的戏剧，布景的方法，都打破向来的传统，而别树一帜。不过跳舞剧的布景又和这些不同，《红花》一剧布景，可谓穷极奢华。连我在巴黎Music

Hall^① 所见过的布景，也远不及此。这戏是用中国材料，所以布景也全然是中国的。剧中人物的服饰大部分是模仿中国旧戏中的服装。剧中客厅花园的布景，华丽到了极点。举一个例，如描写花园的富丽，则用池中游鱼来烘托。其中有一景是用电影来帮忙，把满池的五色鱼映在幕上，自由自在地游泳着。象这样不惜工本的布景——自然这只有在大剧场才有，在苏联特别发展的小剧场，决不会有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音乐也很奇特。因为所用的全是中国调子，配入西洋曲谱，用西洋乐器演奏。其中最常奏的是《梅花三弄》的调子。这是成功和失败，我不懂音乐，不敢断定，但我只觉这一类的音乐和台上的布景和动作，非常调和。

苏联的戏剧理论家，以为西方的戏剧，由宗教剧一变而为宫廷剧，再变而为专供有闲阶级赏玩的心理表现剧，完全失却了戏剧的社会的意义。唯有东方的戏剧尚未脱民间艺术的意味，和大众文艺隔离的不远，所以主张尽量采纳日本古代剧和中国旧剧的布景和表现方法到新剧里去。《红花》之用中国材料而得到绝大的成功，或者也因了这个缘故。本来西洋演剧艺术，自新浪漫主义以后已渐渐走到末路。在欧战以后，伦敦、柏林、巴黎的剧场，除重演旧作品以外，比较伟大的新作品很少出现。在这时候，别树一帜的新俄演剧艺术，于未来戏剧界，一定会有极大的影

① 英语，意译为音乐厅。

响。

生活教育·劳动教育

我到莫斯科以后，本来就注目在文化工作，而于著名全世界的苏俄新教育，更打算详细参观一回。但因为在莫斯科的时间太少，而可看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直延到最后一天，方才匆匆地去参观了一所模范小学校。其实参观新式教育，不要说一天不够，便是费了整礼拜的工夫去视察，也只能看个外表。不曾有从容的时间去参观学校，也是这次旅行中的一件恨事。

在苏维埃国家里，所谓“学校”这个名词的概念，就和别的国家不同。如果我们对于学校，仍带着一般人所具有的概念，这样对于苏联教育制度，不会有正确的理解。因为在一切国家内，学校都被看作一种超社会的特殊的组织。高级学校，是专备造就社会的特殊的阶级的，也只有特殊阶级的儿女，方能进去。至于初级学校则为了造就有效能的劳动奴隶用的。所以学校完全失却了社会性。至于苏联的教育原则，则明白规定着，学校是阶级的，就是为提高阶级文化而设的，学校并不是一种独立组织，却是和生活与劳动，三者结合一体。总之学校乃是社会的。

在别的国家内，学校是专为教育未成年人与青年人而设。因为学校和生活根本不发生关系，所以从学校里得到了资格，学得一些专门的技术，一旦走出校门，以后便不

再和学校发生关系了。在苏联则不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承认教育和生活及劳动密切不可分离。人类生存一天，便须劳动，便须教育。所以在别国学校生活只占人生的一个极其短促的部分，而在苏联则以为学校生活应延长到终身。

因为生活、劳动、教育三件事不能分离，所以社会、工厂（或农场）、学校，这名称不同的三件东西，在实际上也竟看作是同一件东西。在工厂内教育，在学校内劳动，而社会生活也不外教育与劳动。

就苏维埃的教育制度中，基本教育的组织，表面上和别国的差不多。儿童从四岁到八岁进幼稚园或“儿童市”。八岁到十五岁进初级学校。十五岁以上进职业学校、高级学校以至大学。但基本教育不过占了整个教育制度中的一小部分。除基本教育以外，还有各种的补充教育。补充教育之以提高成年人一般文化为目的的，有工人大学、大学夜班、成年人中学等；以职业训练为目的的，有工厂艺徒学校、工人技术夜校、农场管理传习所、机关人员传习所、高等学校预备班等；以灌输大众政治智识为目的的，有工人俱乐部、农村俱乐部、图书馆、博物馆、戏院、报纸、旅行、演讲会、无线电播音、电影等；以共产主义教育为目的的，有共产党大学日夜班、党初中级夜校、党初中级苏维埃学校、党内文化训练部等。此外又有普遍全国的成年人识字学校、工人初级夜校以及识字运动等。这样使工人、农民，在无论何地，无论何时，都有受教育的机

会。而教育的纲领，则又不外以适应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为原则。

苏联施用强迫义务教育，还不过是晚近的事实。因为在革命后的几年，因教育经费与教师的缺乏，普通的义务教育，事实上不能做到。直到去年（一九三〇年）八月政府才下令实施全国普及义务教育，规定以八岁到十五岁的初级学校，为义务教育的期限。在革命以前，俄国识字人数，不过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三，到了一九三〇年，增至百分之六二·六。到五年计划的末年，义务教育推行全国，不识字的人数将减至于零。

但这并不只是发一道命令，定一个计划，就算完事。在一九三〇年，政府新设学校，达四万五千所，学童增加一千四百万人，需要新教师五万人。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全国平民教育经费约增一倍，即从六万一千五百万卢布，增至十万零一千万卢布。初级学校虽大多不收学费，但农村贫苦儿童仍无力入学校，政府特拨出大宗基金，专备补助贫家儿童购买衣履、书本及午餐之用。政府另支出经费，购靴一百万对，赠给农村学童。可见政府推行义务教育，是煞费苦心了。

自从五年计划实施以后，学制也经过一次革新；以前苏联学制，和德、法学制相类似，普通教育定为十年：初级学校七年，中级学校三年。现在则实行“学校的工艺化”，把三年的中级学校裁撤，另外广设职业学校、工厂学校，以代替中等教育。初级学校，则于校内一律附设工厂、

工场或田庄，使儿童于修业时，一面即开始生产的劳动。这样便把教育和劳动完全合为一体。但这“学校的工艺化”和一般所谓“职业教育”，却又完全不同。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业教育，是只使儿童学习工作技能，训练成能产出赢利的劳动奴隶，并不注意于儿童的社会的教育。苏联的新教育制度却不然，使儿童从事劳动不过是养成劳动的习惯，此外对于儿童个性的发展、智力的提高、自然与社会智识的增进，仍同时顾到。这种教育方法的优点，是使学校不至和实际生活隔离，从学校出身的不至变成不事生产的特殊阶级。在这一点，我想现代无论那一国的教育都不能办到的。

一个小学校

我去参观的那个学校，是莫斯科市内模范小学之一。在那里，一切设备和教学法，全是新式的。校舍由前贵族邸第改建，很宽大而不十分富丽。校外校内，树木园庭很多，现在是全被白雪掩盖着，不然，在春季里风景一定是十分秀丽的。

所谓小学教育，可以说就是苏联的完全教育。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初级教育从八岁起到十五岁，共是七年。但是八岁级的学童，大概已在幼稚园及其他幼稚教育机关里，受过四、五年（四岁到八岁）的教育，已有我国现学制国民学校毕业的程度。对于语文与数学已有了相当的智

识。至于高年级的学童，则差不多已达到了智识的成年。有的在十三岁十四岁级已进工厂去作半天工；腾下半天仍在学校读书。新学制虽然规定着初级学校和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或大学校衔接，但事实上据说初级学校修完后，立即升学的很少。大多数的学童修完小学教育后，都愿意进工厂劳动，做了几年的工作，有了相当的劳动经验后，再升入高等学校或大学校。因为在苏联，高等学校、大学校毕业的资格，并不给你社会上特殊地位的保障。所以一般学生并不以升学毕业为荣，反之，对于劳动的兴味，则十分浓厚。

学校内的分级，完全以年龄为标准。例如未到八岁的为八岁级，未到九岁的为九岁级。到十四岁级修完了，就算是毕业，因为在苏联小学校考试是早已废除了的。

不但考试没有，即平时的工作，也完全是自由的，一切都由学生自由选择。科目和各国普通学校差不多，有俄文、外国语（英、德文）、数学、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教学法非常特别。每一种科目都有一个或数个课堂。文学语言与社会科学课堂放着许多参考书籍和图表；生物学、物理、化学课堂放着许多仪器标本。每一课堂内有一位教师担任指导。学生不限年级，亦不限时间，随时可进课堂内工作，由教师指导。（我走进德语课堂，见许多学生读着德文原著的《共产主义者宣言》^①。）这种教学

^① 现通译《共产党宣言》。

法，据说是根据道尔顿制而加以改良的。

课堂以外，更有许多小房间，是学生修业室，学生可随时进去自修。我问过一个女教师，既没有考试，也没有毕业，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考验学生成绩？学生是否有贪懒荒弃课业的情形？据她的回答，用这种新方法，比向来用考试制度，强迫听课制度，学生的成绩要好的多。因为研究是让儿童自由的，大多数的儿童都很勤奋，对于各门功课，都有丰富的兴味。又学校虽没有考试，而学生自己则用社会主义竞争的方法，互相砥砺。这竞争方法是由各级间，或同一级间，或各个人间互相订结契约，限期修完某项功课，到期后举行成绩比赛，由教员评定优劣，成绩最优的，由学生团体给以嘉奖，如成绩不良，则加以名誉的惩罚。例如九岁级的全班学生，与十岁级的全班学生，订约于一年内修完各该级的学科标准；又如同属一级内的学生甲、乙、丙、丁四人共同订约，在一个月内做完代数练习题两百个。全校学生几乎全体都加入竞赛，有许多学生同时加入数种竞赛。但一切竞赛全是由学生自动发起，由学生自动加入，教师不加干涉。这种自动的竞赛方法，比考试制度更容易促进学生的勤奋。因为前者不过是用学校的资格去强迫学生读书，而后者则以社会的荣誉去推进学生工作。少年人，尤其是苏联的少年人，对于社会的荣誉，自然比对于徒存形式的资格看的重了。

只有一种科目是强迫的，便是体育。在俄国学校，锦标式的个人的竞赛并不流行，但对于儿童身体的锻炼，却

非常重视。每天早晨八点，学生进校时，有二十分钟的早操，全体学生必须加入；每天又有三、四次的五分钟徒手操，全体学生必须加入。规定徒手操，是因为恐怕儿童整日不断的工作，于身体脑力有妨害，所以每隔二、三点钟，必须作一回徒手操，学生被强迫加入，不象旁的功课，可以由学生自由选择。

上面说过，依近年新定学制，初级学校都附设工厂农场。这附设工厂农场的意思，并不是要把一切学校，化为职业学校，因为工场与教学全然是两个部分，教学方面是使学生增进一般常识，而工场方面则使学生养成劳动习惯。学生在课堂内的修业，与工场的劳动全无关系。因此即使准备做体力劳动者的，在普通学校内亦必须学习一些文理艺术及生活常识；反之专志学文理纯粹科学的，亦使其从幼年起有劳动的训练。

每个学校内的工场，都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倾向，例如我所看的那个学校，附设着的是制造飞机的工场，有金工室、木工室，所制造的全是飞行机的机件。八、九岁的儿童即开始练习用纸板制造飞机雏型。年纪大一点的先练习木工，后练习金工。木工室、金工室的布置和工作情形，全然和平常飞机制造厂一样，只是另有教师在指导着工作。这样，学生有了七年的劳动经验，待脱离学校时，已成了一个熟练工人，而且是一个完备着一切生活常识的工人了。

工场与课堂是同时开放着，儿童何时进工场劳动，何

时进课堂修业，亦全然由儿童自己选择，学校不加限制。据一般的经验，大多数学童都把每天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工场作工，只把小部分的时间，用在课堂修业。因为少年人往往爱好劳动甚于干枯的书本。

学生的课外集团生活非常发达。我去看的那个学校，每天在下午六点以后，必有学生的讲演集会。每五天为一周，第一天是体育会，第二天是技术或政治讲演会，第三天是音乐会，第四天是军事训练班或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集会，第五天是文化工作的集会，如自由思想同盟的集会或旅行等。校内放着耕田汽车两辆，平时学生在学习开驶方法，一到春间播种期，或秋间收割期，学生带着耕田汽车，到乡村去帮助农民耕种收获。在每年暑假，学生大多被送往乡村儿童殖民地避暑。这样，虽然是在城市中生长的儿童，对于农村生活仍不至十分隔膜。

学校内有大厨房，规模虽没有象阿摩工厂的厨房那样大，但非常清洁，注重卫生设备。全校学生都在校内吃饭，每天五顿，有三顿是正饭，两顿是茶点并有牛乳。吃饭时与工厂的情形相同，须先买票，但价目比工厂食品更低廉，贫穷学生则不收费。苏联初级学校概不收学费，贫苦劳动者的子女，兼免膳费、书籍费，有时由学校供给衣服鞋帽。

这样可以推想儿童们一天到晚在学校中的生活。早晨八点钟就到校早操，早操后在校内食堂早饭。以后整日便在校中修业、做工、游戏、进膳。晚上六点后加入各种公

共集会。到九点钟在校内进了晚餐，方才回家跟着父母睡觉。学校便是整个的儿童社会，社会便是儿童的学校。

这所学校中还附设一个孤儿留养院。留养院的孤儿除和其余儿童共同修业作工外，晚间亦留在校内。有寄宿舍，设备颇清洁整齐。但留养人数却不多。据说这孤儿院是为抚养因革命而殉身者的子女而设的，数年前留养人数甚多，但现在大多已长大，能独立劳动，留下的已不过二、三十人，不久这孤儿院也要裁撤了。

国 家 银 行

在离莫斯科以前，因为要兑换一些钱，又匆匆地去国家银行走了一遭。这国家银行是专理国外汇兑事务的。国外汇兑完全由苏维埃国家银行操纵。苏联货币因资本主义各国的一致拒绝兑换，所以没有国际汇兑市价。在事实上，卢布及“采冯尼兹”（每个值10卢布）只是在苏联境内使用的货币单位，而在国际贸易则又以美金为单位。苏联输出物品所收入的美金汇票由苏联国家银行存储，而以此偿付一切输入物品的货款。所以苏联的国际贸易，输出入必须绝对维持均衡。近年因采行五年计划的结果，购入大量的机器、农具及工业原料，输入骤增，因此亦不得不尽量扩张输出贸易以相抵偿。在苏联境外所听到的“苏维埃探并^①政策”“布尔希维克破坏经济阴谋”这一类耸人听闻的

^① 英语，意译为倾销。

推测便由此而起。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经济制度还只好采取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货币和工钱制度既不能废除，所以利润也还是存在着，不过国家随时可加以制限，不使个人利润特殊膨胀。只有国家银行有权收受储蓄存款。储蓄事业在近年非常发达，因为一般工资增加，失业消灭，而消耗品则购买均有限制，所以劳动者都可有余款去储蓄，国家则利用人民储蓄作工农业的主要资本。R女同志很感慨地说：

“数年前国家银行的存款利息是一分，甚至一分二厘，现在已减到六厘，可见我们的政府现在已顺利的多，需款不象从前的迫切了。”

R女同志更拿出一种公债票给我看。苏联政府公债发行及付还本利的手续，单纯而便利。债票全是不记名的，每张只有象普通明信片那样的大小。正面印花纹及数额，有五卢布、十卢布及十卢布以上的。这些公债的还本期大概都很短，在半年、一年后即开始付还本息。本息还款的数目，便开列在债票后面，制成一个简明的表。例如一九二五年一月发行的十卢布债票，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开始还本，共本利合计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是十一卢布二十戈贝克，一九二六年二月是十一卢布三十戈贝克，这样积累下去直到第四、五年而止，时间越久，本利数目越大，但无论何时其本利总数，只须在表上一索即得。这公债票一到还本开始期，可随时向国家银行兑现，并在一切国营商店、国营机关，可当作现金通用。其性质几和纸币相等。但纸币如藏

着不用，不能增加利息，而此项债票则利息每月增加。所以购买债票的往往到了时期仍不去兑换。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现政府信用的稳固。

两 世 界

“Ĝis la revido! Bonan vojaĝon! Vivu la Revolucio! ……”^①

二月三日薄暮，赶到了城南车站，上了火车，不到两分钟，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车便开行了。我还来不及和送别的朋友们一一握手，这样便匆匆地离开了普罗列太里亚的首都！

在横断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列车中，整日只看见车窗外白雪纷飞，居屋、牲畜、家宅、田庄全被埋在冰雪中，整个世界披上了缟素。每隔半天或一天，列车停在一个大车站，才看得见人类的活动。在荒凉的乌拉山顶史韦尔特洛甫斯克（Sverdlovsk）^②，可望见离车站不远新建的大城市。电车和公共汽车往来不绝。工人住宅的摩天建筑，矗立在车站后方。据说这里的铸铁厂，雇工十万人，已是欧洲最大的，数年后将扩充成为世界最大的铸铁厂。经过奥木斯克（Omsk）、伊尔库次克（Irkutsk）一带，到处可以看见新建的伐木工厂和集产农场的经理处。这自从原始时

① 世界语，意译为：“再见！祝你一路平安！革命万岁！……”

② 现通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代以来，埋在冰雪里，在从前只见鲜卑游牧部落，在近代专供流放政治囚犯的世界最大荒原，现在眼见得要被电气化和机械化所征服了！我们怎能不惊叹人类生活力的伟大呢！

因为大雪严寒，连机关车轮都给冻住了，本来从莫斯科七天可到满洲里的，直到第八天午后方到。到了满洲里后，便换坐了赴哈尔滨的中东路快车，开车已经是黄昏时候。一群饥饿倦怠的长途旅客，都拥入了餐车。中东路餐车的大菜，烹调十分讲究。吃完了以后，我闲坐着倾听邻座旅客们的谈话。

这餐车中不过十余个客人，因为八天来同在西伯利亚车中，有一大半，我都已认识了。其中有一个是在巴黎住过很久的波兰小商人，到上海去谋事的。另一个是南京C大学以重金聘去担任田径赛教授的德国少年。这两个人都生得瘦小机警，因为是第一次到东方，所以爱见人问中国生活情形。此外是一对四十余岁的德国人夫妇，带着一个小孩。男子是上海美最时洋行“大班”。这“大班”夫妇虽然不是体育专家，可是都生得肥胖结实，比我们那位田径赛教授，要肥大到三倍。在西伯利亚车中每次我经过头等车的休息室，见着这一对胖夫妇并肩坐着，我总要替那只沙发叫屈。另有一对较年青的夫妇，是奥国人，也在上海做事，我不知道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六个人围在一只餐桌谈话，小孩则坐在桌角，拿刀叉玩着。因为除了我们那位“武学教授”以外，其余五

个人都是去上海的，所以他们的谈话的中心是关于上海的生活。谈话全用着英语，虽然他们的英语全是怪腔不成调的。

“×先生，今晚你该饱嚼一顿了。在西伯利亚车中每次开饭你总是叫苦不能下咽的。”奥国太太向着波兰商人说。

“是啊，幸亏我们带了许多啤酒、饼干、一大捆上等的腊肠，要不然，我的丈夫早就饿死在西伯利亚冰窖中了。”是胖太太粗糙的声音。

“共产党要钱真是凶，西伯利亚车上这样坏的菜，却要四个马克呢。在上海花了这些钱，我们可以吃两顿上等菜，而且连惠斯克酒^①都在内呢。”

“对啦。上海真是便宜。那次我叫‘仆欧’拿两元钱，去买来一只大母鸡。上海两元，你想，只三个马克。现在银价跌了，才只一个半马克呢。”

“这还不算啊。我那次自己到小菜场去，一元钱就买了一只活鸡。”

“上海的‘仆欧’才更便宜啊。我们家雇的男工，每月只拿十五元工钱，才只十二个马克一个月……又勤力，又忠心。中国人都是这样忠心的。”又是“大班”娘娘的声音。

“有这样的事吗？我在俄国车站，叫脚夫提了三个小皮夹，就花掉六个马克呢。想不到上海是这样便宜的。”于是

^① 现通译威士忌酒。

C大学的教授发言了。

“It’s very, very, very cheap, so cheap……”^①

“哗啦啦！……”

正说的高兴，坐在桌角的孩子，把桌上盆子打落在地上了。我被这声音惊醒，才恍然觉悟，我是已从一个世界，旅行到别一个世界了。

回想在莫斯科七天的生活，和在那里所看见所接触的风景人物，恰如隔夜的梦痕，已无从追寻。

^① 英语，意译为“这是很，很，很便宜的，如此的便宜……”。

后 记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厉行反共的白色恐怖政策，上海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逮捕和活埋。当时，郑振铎等人和我都还是青年，只好流亡国外。郑振铎去了英国，我去法国。因为那时法国货币贬值，生活费用和中国差不多，我没有钱，就依靠《东方杂志》的稿费，在法国读了三年书。后来法国货币涨价了，我无法生活，只好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途经莫斯科，由当地世界语会招待，游览了七天。这本书就是一九三一年回国后写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许出版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刊。我这本书是侥幸出版的。物以稀为贵，出版后就行销国内以及香港、南洋一带。虽然这本书很快就遭到禁止，但在海外翻印的很多，不过在目前就很难找到一本了。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收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重新出版；并且请戈宝权同志为重印本书写了序言，加以校注，改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还增加

了宝权同志搜存的当年的照片。这样这本书变成了我们两人合著的新书，我要对他表示十分的感谢。

事隔五十余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莫斯科也有了变化。但是，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是没有变的。留下这本书作一个宝贵的纪念。

胡愈之

1984年3月于北京